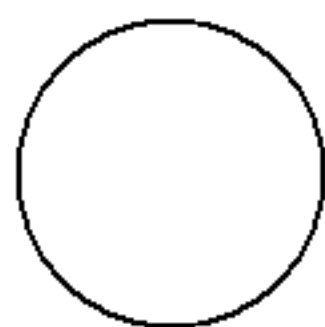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10-11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十一期合刊 ★

目 录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

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熊 复 (1)

——庆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党四十三周年

充分发挥铁路运输业支援农业的作用 ... 吴 众 (19)

可贵的革命干劲 中共湘潭地方委员会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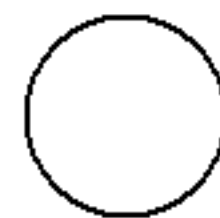
物理学研究中的理论和实验 周光召 何祚庥 (29)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

斗争 (续完) 郑言实编 (37)

☆ 五月二十日出版 ☆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 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庆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党四十三周年

熊 复

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保卫民主自由的斗争，十多年来有了迅速的发展。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粉碎了荷兰殖民主义者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企图重新把印度尼西亚变为殖民地的梦想，击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扶植的国内反动势力对人民革命事业的猖狂进攻。在这一斗争中，印度尼西亚人民大大地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创造了丰富的有益的經驗。印度尼西亚反帝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有力地鼓舞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对挫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印度尼西亚人民富有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光荣传统。自十五世纪末以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殖民者先后侵入印度尼西亚。从十七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三百多年中，荷兰殖民者逐步蚕食和侵占印度尼西亚。在那黑暗的漫长的岁月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了实现民族独立的愿望，从未停止过对外国殖民者的反抗。一九二〇年五

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和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的历史里程碑。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九二六年印度尼西亚人民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给荷兰殖民者以沉重打击，打破了所谓荷兰殖民统治千秋万世的神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殖民者，仅仅在八天内，就把印度尼西亚交给了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法西斯军事占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民主力量，不顾日本法西斯的残酷迫害，为驱逐日本法西斯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直到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印度尼西亚人民开始了以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为主要内容的八月革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成立了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但是美、英帝国主义和在它们支持下的荷兰殖民者，互



相勾結，一意要扼杀印度尼西亚人民爭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斗争。当时，英帝国主义者以接受日本投降为名，向印度尼西亚派遣军队，并利用日本法西斯军队，为荷兰殖民者“重新征服”印度尼西亚开辟道路。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调遣军队到印度尼西亚，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发动军事进攻，妄图重新恢复它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美帝国主义者则以大批武器和金钱供给英、荷殖民者，极力支持它们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军事进攻。荷兰殖民者一方面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加紧军事进攻，实行经济封锁，一方面在“和平谈判”的幌子下，采取分裂印度尼西亚抗荷阵线的团结的手段，拉拢和收买印度尼西亚的妥协派和投降派，企图内外夹攻，颠覆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荷兰殖民者利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叛徒先后建立了东印度尼西亚等十五个傀儡邦，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相对抗。

为了保卫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以苏加诺为代表的其他爱国民主力量一起，在“一旦独立，永远独立”等战斗口号下，发动人民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反侵略的武装斗争。这一斗争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和进步舆论的支持。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打击下，英、荷帝国主义者用军事手段扼杀共和国的阴谋遭到失败。但是，当时以右翼社会党人沙里尔为首的政府执行妥协和投降的政策，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同荷兰殖民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林牙椰蒂协定”。沙里尔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印度尼

西亚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人民的压力下，一九四七年六月沙里尔政府被迫倒台，共产党人沙利佛丁领导组成了新的政府。

荷兰殖民者没有达到迫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就范的目的，并不就此罢休。沙利佛丁政府成立不久，荷兰殖民者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印度尼西亚发动了全面性的殖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帝国主义除了继续供给荷兰殖民者以大量的武器、贷款外，还派遣军事人员为荷兰殖民者修建机场，直接帮助荷兰殖民者完成各种军事部署。美帝国主义还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定，成立了美、比、澳三国“斡旋委员会”，公然干预印度尼西亚内政，拉拢印度尼西亚的反动派，策划颠覆沙利佛丁政府。当时，沙利佛丁政府曾领导共和国军队和游击队对荷兰殖民者的武装进攻进行了坚决抵抗。不幸的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压力下，沙利佛丁政府在一九四八年一月解体，政权落入了反动的哈达内阁的手里。

哈达政府执行亲帝国主义、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政策，同帝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这个政府一成立，就遭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坚决反对。广大的人民群众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他们提出了改组政府、坚持印度尼西亚完全独立和改善生活的要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民主党派、团体，反映广大人民的愿望，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召开会议，制定了“民族纲领”，要求改组哈达政府。

为了更有力地领导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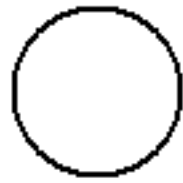
和国内反动派作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结了八月革命以来党的活动的经验，通过了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决议。艾地同志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发展》一书中指出，“《新道路》的决议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更好地进行工作奠定了基础。”“《新道路》的决议是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的重要的第一步。”“《新道路》决议中所阐明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新政策有力地重新唤起了群众的斗争，因此也就有可能促使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

哈达政府为了阻止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继续发展，破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的团结，在荷、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制造了血腥的“茉莉芬事件”。哈达政府捏造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茉莉芬“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国家”的谎言，并以此为借口到处追捕和杀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反对猖狂的白色恐怖。在这一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表现了高度的英雄气概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们为维护民族利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许多著名领袖和重要干部壮烈牺牲，约一万名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

其他阶层群众及其领导人惨遭杀害。但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革命暴行，并没有能扑灭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的怒火，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发展。

荷兰殖民者为了把印度尼西亚人民完全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实现它早就提出的妄图全部吞并印度尼西亚的所谓“联邦政府”的罪恶计划，在紧接着“茉莉芬事件”之后不久（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又悍然向印度尼西亚发动了大规模的殖民战争，企图用武力逼迫印度尼西亚人民投降。荷兰殖民者的武装侵略，再一次激起了印度尼西亚爱国军民奋起抗战。许多被关在集中营中的共产党员，得知荷兰军队进攻以后，千方百计地逃出集中营，奔赴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最前线。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荷兰殖民者展开的广泛的游击战争，给了荷兰殖民者以新的沉重的打击。当时，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它在东南亚的侵略利益，继续操纵联合国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干涉，胁迫印度尼西亚政府接受荷兰殖民者的无理要求。代表印度尼西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哈达政府，屈从于帝国主义，背叛民族利益，在美帝国主义以联合国名义的导演下，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同荷兰殖民者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的“圆桌会议协定”。

关于“茉莉芬事件”和荷兰殖民者对印度尼西亚发动的第二次殖民战争，艾地同志一九五三年在《走向新的印度尼西亚》一文中做了这样的论述，他说：“茉莉芬挑衅事件的目的



的，就是企图粉碎工人运动及其领导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而使独立运动脱离它的革命的领导以至全部瘫痪。以后的事实证明，茉莉芬挑衅事件也是发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的第二次殖民战争的一种准备。这次殖民战争是为了施加压力，强迫印度尼西亚人民接受卖国的协定，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印度尼西亚方面的哈达、苏丹·阿卜杜尔·哈密同荷兰王国方面的马塞芬在美帝国主义代表美尔勒·柯契兰监督之下在荷兰签订的圆桌会议协定。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就是这样背叛了民族利益；他们宁愿将印度尼西亚奉献给荷、美帝国主义，自己充当其忠实的奴僕，却不愿同共产党人和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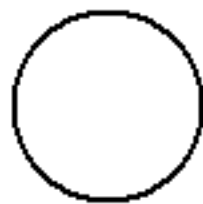
上述事实表明，从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开始，到一九四九年签订“圆桌会议协定”这一历史时期中，印度尼西亚出现了极为曲折复杂的政治局面，交织着严重的民族的、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帝国主义发动血腥的殖民战争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制造分裂、国内反动派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分裂、反对投降的斗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绞杀革命力量、制造白色恐怖的反革命战争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反白色恐怖的自卫战争；等等。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印度尼西亚人民高举着八月革命的光荣旗帜，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前仆后继，坚持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为完成八月革命的任务而英勇

奋战。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帝斗争的革命精神，受到世界人民的敬佩和赞扬。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虽然暂时遭到了挫折，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有益的經驗教训。

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发展》一书中，总结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这一段时期中的經驗教训时指出：

“八月革命（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已经遭到失败，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面临这次革命时还没有总结出它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經驗，而且在武装斗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上没有經驗。

“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但是它已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取得了统一战线的經驗。这次革命给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重要的經驗，即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的經驗；在一定情况下，它能够参加革命及采取坚决的态度，站在革命方面；但是，在别种情况下，它会动摇和叛变。因此，无产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一贯地不断地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到革命方面来，但也必须防备他们背叛革命的可能性。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大大地影响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党的进展或后退以及革命的进展或后退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相反地，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党的进展或后退以及革命的进展或后退。



“在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过程中，党不可以放棄其独立性，并且不可忽視最可靠的、为数最多的同盟者，即农民。

“这个革命也已经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取得关于党的建設問題的經驗，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更了解印度尼西亚社会情况、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特点和規律，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有可能来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并学习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實踐結合起来。

“在革命中，武装斗争是最重要的斗争形式，这也是一个經驗。党的发展除了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統一战綫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进展与后退对統一战綫和党的进展与后退是很有影响的。”

二

一九四九年“圓桌會議协定”簽訂以后，印度尼西亚人民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形势。

“圓桌會議协定”的簽訂，使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变成了半殖民地的国家。虽然荷兰殖民者表面上承认印度尼西亚享有所謂“自治的权利”，但事实上，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政权，完全为帝国主义首先是荷兰殖民者所操纵。印度尼西亚变成了所謂“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的一个成員。荷兰殖民者的民政和軍事官員繼續控制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机构与军队。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貿易被荷兰殖民者所控制。重要的經濟资源仍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掌握。占印度尼西亚国土百分之二十、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有着丰富矿产尤其是有着鋇矿的西伊里安，仍完全为荷兰殖民者頑固地霸占着。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圓桌會議协定”为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侵入印度尼西亚大开方便之門。在“圓桌會議协定”簽訂以后，美帝国主义利用印度尼西亚反动政府，把一系列掠夺和奴役性的协定强加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头上，擴張它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經濟势力。美帝国主义更加蛮横无理地干涉印度尼西亚內政，并以武器、金錢援助印度尼西亚反动势力，鎮压印度尼西亚革命力量。事实清楚地表明，美帝国主义愈来愈成为印度尼西亚的最危险的敌人。

代表印度尼西亚封建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社会党和馬斯友美党，控制着中央政权和武装部队。它們对外倒向帝国主义，忠实地履行“圓桌會議协定”，对内坚决维护封建土地制度，执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在印度尼西亚，进步的爱国民主力量和反动的民族投降主义力量之間、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間的矛盾和斗争，在更加尖锐地发展着。

在这种形势下，廢除“圓桌會議协定”和收复西伊里安成为印度尼西亚全民族的要求。在“圓桌會議协定”簽訂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治局随即发表声明，揭露“圓桌會議协定”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应当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印度尼西亚的完全独立。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廢除屈辱的、

在这種形势下，廢除“圓桌會議协定”和收复西伊里安成为印度尼西亚全民族的要求。在“圓桌會議协定”簽訂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治局随即发表声明，揭露“圓桌會議协定”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应当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印度尼西亚的完全独立。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廢除屈辱的、



不平等的“圆桌会议协定”和收复西伊里安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五四年六月，印度尼西亚临时议会就收到了要求废除“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等提案或决议共一百六十三件，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提案或决议共三百九十四件。印度尼西亚大多数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都把对于上述两个重大政治事件的主张列入自己的纲领中。印度尼西亚爱国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纷纷集会，发表决议、声明或宣言，坚决表示为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收复西伊里安而斗争，而且这种呼声一年比一年强烈。印度尼西亚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以政治性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展开了斗争。在革命工会和革命农会的领导下，工人和农民在外国（主要是荷兰）企业中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和占地运动。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领导了七十万外国（主要是荷兰）农园企业工人举行大罢工，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领导下的农民占地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根据一九五四年印度尼西亚政府的一项法令中的统计材料，在印度尼西亚有十五万以上农户（七十五万多人）参加了占用外国农场土地的斗争，农民占用外国（主要是荷兰）农园的土地，仅在爪哇岛，就占该地农场企业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在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荷兰殖民者被迫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宣布取消“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废除“圆桌会议协定”中关于强迫印度尼西亚同荷兰殖民者进行军事、

外交和文化“合作”等协定。这一切说明，围绕着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印度尼西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圆桌会议协定”签订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新的形势看到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恢复党的合法地位的可能性。党在这个时期一开始，就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工作。一九五一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形成了以艾地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组成新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制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章，这就加强了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百倍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由于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完全民族独立的斗争开始了新的高涨，由于党在这个时期一开始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把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同进行党的建设的任务结合起来，因而使民主力量日益发展，反动力量日益孤立。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其他爱国民主力量一起，同印度尼西亚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粉碎了苏基曼政府“八月大逮捕”的阴谋，并推翻了这个政府。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印度尼西亚组成了没有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参加的、以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总理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反帝爱国方面采取了某些符合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愿望的措施。

一九五四年三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这次代表大会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一切基本的和重大的问题。代表大会的总结指出，印度尼西亚要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出路在于改变帝国主义者、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一方同人民另一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出路在于唤醒、动员和组织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群众。代表大会规定两项紧迫任务：第一，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封建主义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第二，继续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这次代表大会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飞跃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实现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任务方面进行了艰巨卓越的努力。它继续为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收复西伊里安而进行斗争，增强自己同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的团结。印度尼西亚爱国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革命反人民阴谋不断受到打击，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一九五五年，根据苏加诺总统提出的“以团结全民族力量来收复西伊里安”的号召，在雅加达举行了全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出席大会的包括七百多名由各地区选举出来的代表，各党派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以及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大会通过了为争取解放西伊里安而斗争

的纲领和宣言。纲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调整人民力量的四项决议。其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是：成立西伊里安省政府；断绝同荷兰的外交关系；废除“圆桌会议协定”；没收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所有财产；削弱并扫除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势力；加强民族经济；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一切危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人民利益的协定；等等。全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的纲领和宣言，反映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基本愿望，因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一九五六年，第二届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单方面宣布全部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并且取消对荷兰数达三十六亿六千一百万荷盾的“债务”。“圆桌会议协定”的废除，使得印度尼西亚除西伊里安外的全部国土基本上取得政治独立。这一斗争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印度尼西亚人民进一步为清除荷兰殖民主义势力、收复西伊里安而斗争。

一九五七年，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一九五七年十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全国成立了解放西伊里安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军政当局代表外，还包括群众团体的代表。在解放西伊里安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千百万群众立即在全国各地连续不断地掀起了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十月二十八日，雅加达有十万名青年举行了火炬游行。十一月十日以后，印度尼西亚各地人民纷纷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单是十一月十八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就有一百多万人参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底，在美、荷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大会否决了关于西伊里安問題的提案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苏加諾总统领导下，采取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在全世界反殖民主义力量的支持下，鏟除荷兰殖民者侵略势力的“另一条道路”的斗争方針，展开了接管荷兰企业的运动，使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一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起着先锋作用。斗争一开始，所有在荷兰企业工作的工人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工人群众同其他阶层的爱国人民在接管荷兰企业的斗争中，克服了荷兰殖民者的各种反抗和破坏，接管了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种植园、工矿企业、銀行和保險公司等。现在荷兰資本除少数与其他外国合营的企业外，都已被印度尼西亚政府收归国有。

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印度尼西亚反帝爱国力量的团结日益巩固和增强，美帝国主义和荷兰殖民者及其走狗陷入了愈加孤立的境地。荷兰殖民者为了保住它在印度尼西亚殘存的殖民利益，顽固地拒絕印度尼西亚人民收复西伊里安。美帝国主义者把西伊里安当作它和东南亚条约組織在西南太平洋的重要軍事基地，当作它对印度尼西亚进行軍事威胁、顛复活动的跳板。它一直通过各种阴谋手段，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

新老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勾当，激起了印度尼西亚人民举国一致的憤怒，他們愈来愈坚决地要求解放西伊里安。一九六一年十

二月十九日，苏加諾总统頒布了解放西伊里安的各项命令，宣告同荷兰殖民者进行坚决的、全面的斗争，号召全国人民和全体武装部队准备解放西伊里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民主、团结和动员”的战斗口号，号召全体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鋤”，大力支持并贯彻执行三项命令。印度尼西亚人民热烈响应了苏加諾总统的号召，各地报名参加解放西伊里安的人数达到五百万人，两千名志願軍远征西伊里安，同西伊里安人民游击队配合作战，先后占领了西伊里安的一些城鎮。

印度尼西亚人民武装力量的英勇作战，連續給荷兰殖民者以打击，使荷兰殖民者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荷兰殖民者终于被迫同印度尼西亚进行談判，并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关于西伊里安問題的协定。根据会谈协定的規定，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以前，作为荷兰把西伊里安行政权移交給联合国临时执行机构管理的第一阶段，在这以后，这个机构的行政长官将有权在任何时候把全部和一部分行政权移交給印度尼西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西伊里安将降下荷兰国旗，升起印度尼西亚国旗。

在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关于西伊里安問題的协定签订后，艾地同志指出：这个协定是一项艰巨工作的开端，“經驗提供了許多教訓。联合国的管理实质上是美帝国主义的管理”。艾地同志強調說：“当帝国主义签订协定的时候，它們并不心甘情愿，它們当时已有



了破坏这项协定的全面计划。人民对帝国主义存戒心是永远正确的。”他号召人民继续执行苏加诺总统的三项命令，为完全解决西伊里安问题而斗争，避免使西伊里安重蹈刚果的覆辙。

由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继续坚持斗争，今年五月一日，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接管了西伊里安的全部行政权。这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在收复西伊里安、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正如苏加诺总统指出，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的胜利，是印度尼西亚采取全面对抗政策和执行三项命令的结果。他说，我们的口号是：“我们爱和平，但是我们更爱独立”，对帝国主义必须进行斗争。他还说，虽然西伊里安已经解放，但是，完成革命还要走很长的路，只要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还存在，就必须继续斗争。

三

印度尼西亚人民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是同新老殖民主义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外交上的严重斗争，同时又是一场反叛乱、反颠覆的残酷的军事斗争。美帝国主义和荷兰殖民者妄图重新奴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侵略活动，接二连三地遭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沉重打击，依附于它们的沙里尔、哈达、纳席尔、苏基曼等几届反动内阁，在人民的压力下都先后倒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处于连续失败的困境下，就以公开发动军事叛乱和颠覆活动的手段，妄图

扑灭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长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和荷兰殖民者豢养和指挥着印度尼西亚十几种武装匪帮集团进行叛乱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国运动”（在爪哇）、“南摩鹿加共和国”（在摩鹿加群岛）和“全亚齐伊斯兰学者联合会”（在苏门答腊北部）等叛乱集团。一九五六年，美帝国主义和荷兰殖民者更先后策动、支持卢比斯、侯赛尼、西姆波朗等反动军官发动了军事政变和武装叛乱。一九五七年，美帝国主义支持“全面斗争约章”集团在北苏拉威西发动叛乱。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唆使右翼社会党和马斯友美党在中苏门答腊和北苏拉威西等地区进行武装叛乱。

铁的事实证明，美、荷、英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是印度尼西亚各种叛乱活动的罪魁祸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直为印度尼西亚叛乱集团运送大批军火、粮食，提供活动经费，派遣军事教官，指使叛乱集团破坏国内经济，杀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等等。不仅如此，美国第七舰队还曾试图在北干巴鲁登陆。美国甚至还派军事人员驾驶飞机在印度尼西亚东部若干地区滥肆轰炸，直接参加叛乱。美帝国主义者大肆叫嚣，诬蔑印度尼西亚人民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威胁着“西方在太平洋的防卫线”，宣称美国“可能不得不再为争夺这个缺口而战”，并且说什么“印度尼西亚的分裂活动将使收复西伊里安的计划不可能实现”。

美帝国主义和荷兰殖民者所制造的连续不断的叛乱，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遭到严重



的困难。可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低估人民的力量，錯誤地估計形势。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人民的支持下对帝国主义策动的武装叛乱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艾地同志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发表声明，全力支持苏加諾总统采取的坚决镇压叛乱分子的方針，主張进一步动员和团结一切力量支持中央政府粉碎叛乱分子的阴谋。在保卫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事业的召唤下，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地投入了平息叛乱的战斗，許多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此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印度尼西亚人民终于赢得了平息叛乱的重大胜利。策动叛乱的右翼社会党和馬斯友美党自食恶果，在一九六〇年八月被宣布解散。

印度尼西亚人民虽然已经取得了平息叛乱的重大胜利，但是，反革命叛乱的社会根源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势力并没有被消灭，它們顛复和推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活动也絕沒有停止。美帝国主义者还在印度尼西亚极力扶植它的政治代理人，并利用当前印度尼西亚国内存在的经济困难，加紧破坏活动。在经济方面，美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大力进行渗透活动，美国壟断資本今天已经占外国在印度尼西亚投資的第一位。此外，它还向印度尼西亚人民散布反动腐朽的帝国主义文化。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它在印度尼西亚推行的新殖民主义，决不会放松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破坏活动。美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最危险的头号敌人。印度尼西亚人民面临着反对美帝国主

义的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

四

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叛乱斗争的同时，展开了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的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向主張，为了組織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完成民族革命任务，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竭尽全力解决人民衣食问题。党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些目标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农民为摆脱封建土地制度束缚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土地归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等基本口号，认为革命的农民运动当前是以展开“六好运动”（包括减租、减息、提高雇工費、提高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文化和政治水平）为中心内容。广大农民群众首先是雇农和貧农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包括反对外國地主夺占农民的土地；要求贯彻执行苏加諾总统颁布的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法令，争取实现六四分配（地主最多得四成，农民至少得六成）的要求；沒收那些支持或参加叛乱集团的地主的土地，满足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的需要；要求实行乡村政权民主化；等等。通过这些斗争，成功地把农民动员起来結成了反对地主的广泛的陣綫。

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为维护工会民主权利和改善生活的斗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工会运动中的最大成就是，革命的中央职工会組織——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更加壮大起来了，有势力集团瓦解革命的中央职工会組織的活动已經遭到失敗。在实现解放西伊里安的人民的三項命令的範圍內，中央职工会組織也取得了建立合作联合書記处的胜利。印度尼西亚全国不少城市的工人和其他的劳动人民，通过罢工等斗争方式，提出了增加工資、改善待遇、防止物价高漲、反对无理解雇等要求，这些斗争获得广大社会公众的同情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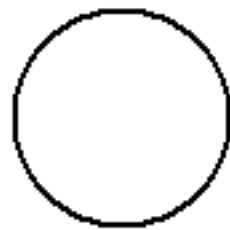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七年二月，苏加諾总统宣布了他的以建立包括宗教信仰徒、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三种力量的互助合作內閣为内容的方案，一般称为“苏加諾总统方案”。这个方案公布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立即表示贊同，并且号召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方案和为实现該方案而努力工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指出，“苏加諾总统方案”要求成立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互助合作內閣，这个方案要求有更健全的民主，它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完成民族革命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完全实施，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在彻底完成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要求方面跃进一大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断揭露和批判印度尼西亚反动派破坏“苏加諾总统方案”的企图，认为要实施“苏加諾总统方案”，就必须不断宣傳这个方案，不断地把人民力量組織起来，去改变力量的对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指出，成立互助合作內閣，已經成为日益强烈的要求。艾地同志在今年二

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說：“从一九六二年末到一九六三年初，成立‘納沙貢’* 內閣的要求是很强烈的。在这段时期內，成立‘納沙貢’內閣的要求第一次得到‘納沙貢’的支持。在此之前，只有共产党人、进步的群众和加諾兄談到这个問題（加諾兄在总统方案中用了‘互助合作內閣’一詞）。現在，成立互助合作內閣或‘納沙貢’內閣的要求也得到民族主义政党（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印度尼西亚党，等等）、宗教政党（白尔蒂伊斯兰教党以及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的地方领导人，等等）的支持。印度尼西亚新聞工作者协会也支持这一要求。所有这一切表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表现了我国的政治局势的新发展，表现了人們对国家大事、人民的事业以及寻找克服困难的出路的認真負責的态度。”艾地同志說：“要求成立‘納沙貢’內閣呼声的高漲使得反动派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也說明了中間力量向左发展，进步力量更加壮大和巩固。这就意味着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团结更加强大了。”

五

多年来，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結果表明，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不管新

* “納沙貢”是印度尼西亚文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主义者的縮写。



老殖民主义者及其扶植的反动势力对人民的革命怎样进行镇压和反抗，或者采取什么样的阴谋手段，最终必然要归于失败。革命的人民的力量尽管在斗争中会遭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但是，只要他们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敢于胜利，就一定能够战胜和必将战胜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现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正在继续为完成八月革命的任务而斗争。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所取得的胜利只是初步胜利，当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还面临着下列三项最紧迫最实际的任务：

第一，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这就是要毫不懈怠地加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西伊里安的力量，使西伊里安不致于重新变成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地区，不致于被帝国主义者变为自由进行投资的场所，不致使帝国主义一旦认为有必要时就能借口“保护他们在该地区的财产”而派遣军队到那里去。在巩固治安成就方面，进步人士，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须把治安问题当作是自己的问题，因此必须和负责治安的有关方面进行良好的合作。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同时必须给人民以自由，使人民无论在提高生产方面或者在打击反革命方面能够发扬战斗精神。必须成立有“纳沙贡”参加的协助革命领导协商机构，以协助苏加诺总统在没有战时戒严状态的情况下行使最高职权，以完成现阶段的革命；同时，还必须巩固民

族阵线，反对反动分子破坏民族阵线的企图。维护民族阵线同维护政党制度不能分开。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民族阵线中团结起来，是为了在执行共同纲领，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治宣言》时团结起来，并不是要把不能溶化在一起的东西溶成一体。现在在印度尼西亚有十个政党，应当由哪一个党来当先锋，这要由人民来决定。只有为维护人民的利益和为人民的斗争的忠心耿耿的党，才能取得这种先锋的地位，而不是根据主观愿望，也不是根据什么法律或条例所能决定的。民族阵线已经而且将要起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生活中将会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克服经济困难。在整个经济建设方面，必须实行以农业和农场为基础、以工业为骨干的原则。只有实行这一原则，印度尼西亚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粮食和衣着的问题，工业化的基础才能奠定，对外国的依赖状态才能消除。克服印度尼西亚经济困难的真正出路，并不是向外国乞求借款，或者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变成投在印度尼西亚的外国资本的佣人，而是必须把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这就是说，必须敢于通过牺牲城乡少数大剥削者即官僚资本家、买办和地主的利益，而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来改变国内的社会制度。在克服目前经济困难的问题上，在印度尼西亚存在的三种力量对解决经济困难有着三种方案。顽固势力或反动势力认为，只有引入外国资本和实行以帝国主义贷款为基础的“稳



定经济计划”，才能克服经济困难。进步力量认为，只有通过动员印度尼西亚所有人民的力量和天然资源，才能克服经济困难。这个方案已经被正式采纳为国家的指导方针。进步人士认为，真正的经济援助只能从同我们一起进行反帝斗争的那些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取得。这只不过是援助而已，不是决定性的。中间势力承认动员全国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害怕这条路充满困难，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他们愿意谋求“没有危险”的外国援助和投资。这个方案看起来同顽固势力的方案不同，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方案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取得外援，而不区别什么样的外援，对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没有警惕性。现在中间势力的左翼有了新的觉悟。他们认识到，只有成立“纳沙贡”三种力量的互助合作内阁，才能有力地实施克服经济困难、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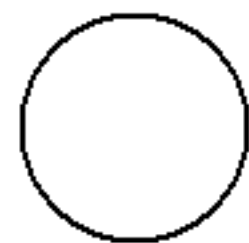
第三，反对新殖民主义。这就是在反对荷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最危险的头号敌人。荷兰帝国主义仍然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危险的敌人，因为它仍然拥有为数相当大的投资，因为它还要就已被接管和收归国有的企业的问题提出无理的要求，因为它还保有旧的政治关系，并力图改头换面重新建立这些关系。最近，英帝国主义出来推行它的马来西亚计划，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也出来实行他们的经济渗入，这一切已经引起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警惕。但是，现在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活

动的所有的帝国主义当中，印度尼西亚人民最危险的头号敌人是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它在印度尼西亚已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影响。美帝国主义正在利用“稳定经济计划”的名目，企图在印度尼西亚建立变相的“争取进步联盟”。美帝国主义还在向印度尼西亚兜售所谓“和平队”。从美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影响，从它的投资，从它的军事和文化渗入来看，它都超过其他帝国主义。因此，反对新殖民主义危险的斗争，首先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艾地同志指出，对于以上三项任务，它的核心应当是克服经济困难。他说，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的困难，就不可能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同时，顽固派，首先是右翼社会党人和官僚资本家，就有可能更加容易地通过一些重要官员向政府提出他们的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方案，而中间派也会很容易囫圇吞枣地接受那种新殖民主义经济方案。

六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经历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印度尼西亚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进行了反复的较量 and 斗争，党也就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科学地分析了印度尼西亚的阶级关系，指出，在印度尼西亚存在着三种力量和三种方案。“第一种力量，顽固力量，也就是反动力量；他们



的方案要把印度尼西亚变成仅仅在形式上独立，而在实际上则向帝国主义屈服，并且维护外国大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的国家。他们说这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目的。第二种力量，进步力量，也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他们的方案要求从印度尼西亚土地上清除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同时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坚决贯彻‘土地归农民’的口号。第三种力量，中间力量，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方案是反帝反封建的，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要求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变革，使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发展。”从这种基本分析出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尽力和不倦地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力量”的政治路线。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是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行这一正确的政治路线分不开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强调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把这个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党非常重视农民工作，它认为，农民是重要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固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人民斗争的基础，是全体人民反对外国敌人斗争的基石。在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向革命人民发动了法西斯的恐怖镇压，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而当时党在农民中又没有强大的依靠，致使革命力量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鉴于这种历史经验，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经常向自己的干部阐明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使他们懂得，印度尼西亚的人民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土地革命，没有占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农民的积极参加，不建立起强大的和巩固的工农联盟，就谈不上人民的胜利。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树立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进行有效的领导。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说：“我们仍然坚持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结论，即‘当我党还不能组织和领导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时候，就不可能谈到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族统一战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制定了革命的土地纲领、农村工作的阶级路线和政策，并派遣党的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培养农民干部，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农民组织，在农民中间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细致的工作。经过这样的艰苦努力，印度尼西亚革命农民的組織力量空前壮大，党在农民中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强，并同农民建立了共呼吸同命运的血肉联系。

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地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有过合作和分裂的经历，有了正面和反面的丰富经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强调指出，在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阶段中，“党必须大力地反对过



高估計与民族資產階級的联合而过低估計工人階級的領導与过低估計工农聯盟的右的偏向”，防止“拋棄党的獨立性的危險”和“把自己与資產階級溶化在一起的危險”；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左’的偏向，防止宗派主义”。根据这种精神，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处理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关系时，支持并推动民族資產階級采取进步的措施，批評它的动摇态度，必要时反对它的反动措施。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民族資產階級統一戰綫关系中的一个现实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参与資產階級政府和議会的活动。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根据本国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并根据这样的主張进行工作和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中这样写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目的是把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在一个民族統一戰綫之内，并通过千百万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建立一个人民民主政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不把它在議會中的工作看作是最主要工作，而且也不把議會工作看作是唯一的斗争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忽視議會选举和議會斗争，也不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今后在人民民主政府組成以前的各届政府都采取同一的态度。完全不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馬克思主义对于具体情况和力量对比的分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参加并将繼續最积极地参加議會选举和議會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充分了解它的政治責任，它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議會工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每一届政府并不是

采取一視同仁的态度。在一定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政府并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它，在別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政府，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政府。”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社会和印度尼西亚革命》一书中也明确地指出：“由于人民的敌人使用所有的斗争形式，因此，我們同样必須善于利用所有的斗争形式。我們必須善于利用公开和合法的、为宪法、法律和条例以及社会風俗习惯所允許的一切活动形式”。“当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工作不仅仅是議會工作，而且首先是包括在群众中的工作，即在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和劳动群众及其他民主群众中的工作。所有这些工作，無論是在議會內和議會外，都是为了改变以帝国主义者、地主階級和买办資產階級为一方和以人民力量为另一方的力量对比。在利用这个斗争形式的时候，为了达到党的目标，我們必須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成就的取得，是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党的建設工作分不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为了使党的政治路綫变为现实，“最中心的问题是党本身的问题，是党的建設問題。”十多年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直为建設一个全国性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完全巩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了艰巨的努力，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十分重視在自己队伍



中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強調把党的建設工作重点放在思想建設方面。它对党员提出的学习和工作的口号是：“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熟悉情况。”它善于激发党员和干部学习政治理論的热情，善于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党员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它善于总结本国革命經驗，也善于从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批判性地吸取思想力量，以提高全党的理論、政治思想水平。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教育全党树立理論和实际相結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和进行自我批評的工作作風，确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把轰轰烈烈的工作同埋头苦干的工作結合起来，把鼓动工作同在組織、教育、政治和意識形态方面进行实际的、深入的和細致的日常工作結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的工作方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依靠这种群众路綫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使党的綱領和政策日益深入人心，从而把广大的群众紧紧地团結在自己的周圍。

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长期重視党的建設，由于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批評和自我批評等項原則，全党形成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团結一致，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已經得到巩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組織建設同思想建設的发展是相适应的。現在，它的党员人数已經从一九五一年不到一万人增加到二百多万人，党的組織已經遍布全国各地。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印度尼西亚共产

党不愧为一个始終保持着革命朝气的无产阶级先鋒队。正如艾地同志所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像一棵根多而深深扎入土中的枝壮叶茂的榕树一样茂盛地生长着”。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同时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党。艾地同志說：“自党建立那天起，直到今天，而且还可以断然地說在将来，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給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生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将继续不懈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一致和崇高威望而斗争，成为这个强大的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言論和实际行动中贯彻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为它们相信，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主、和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的运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既是爱国者，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作为爱国者将继续为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运用到我国的具体条件中去而斗争，換句話說，我們說这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并且我們在这个基础上創造性的确定我們的党的政策、策略、斗争形式和組織形式。这是党同群众和全国人民日益团結的基本保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向根据这种精神，在指导国内革命的同时，积极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坚决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維護世界和平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始終坚持和坚决維護莫斯科宣



言和莫斯科声明。它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它指出，宣言和声明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普遍斗争方面，必须忠实地遵守和执行的共同指南和纲领，在实践中忠于宣言和声明是衡量一个共产党的纯洁性的主要尺码。艾地同志在今年以来的几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强调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着反对修正主义的光荣传统，从它建立的时候起就反对修正主义。他说：“我们的党作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将继续反对古典的和现代的修正主义。停止反对修正主义就意味着不再走革命的道路，意味着不去认真的对帝国主义和其他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而这样行动的党在它自己还没有发现它已经背弃人民以前就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他还强调，不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活动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必须不断地揭露和斗争；击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就是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热爱和平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决揭露和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继续把大笔美元花在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身上，以使他们能够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和团结，阉割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因此，必须“对它展开积极的斗争”。不久以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雅加达委员会和棉兰委员会分别举办的群众大会上，重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决心。他说：我们对南斯拉夫的批评不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的范围。全世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强调要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并规定这样做是一种义务。假定莫斯科声明中没有规定这个义务，印度尼西亚革命者也还是要批判他们。为什么？因为如艾地同志所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南斯拉夫的批评决不是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具体地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正在破坏亚非工人的团结。具体地说，他们曾企图破坏“科伦坡会议”。具体地说，他们正在鼓励马来西亚。具体地说，他们正在同印度尼西亚的右翼社会党分子进行合作。这种证据还能举出一些来。

为了使全体党员坚持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优良传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再用它的长期斗争的经验向党员强调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并且明确指出，要坚持这一原则，党就必须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不断地进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的经验教训》一书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必须结合起来。这证明了下面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没有



革命的理論，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沒有实践，理論就沒有用。为了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須永远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具体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又說：“长期以来，即自从我們的党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重建以来，我們就一直对古典教条主义展开斗争，因此今天我們的同志們已經了解，要硬搬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上的‘現成’公式，而不考虑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情况，那是錯誤的。在最近这段时期，我們成功地同現代教条主义，即对各兄弟党現在的經驗、結論和綱領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的作法进行了斗争。当然，我們必須研究各兄弟党最近的經驗、結論和綱領，但是其目的并不是要 不加批判地、愚蠢地和不負責任地把它們变成我們自己的党的东西。这样一种态度，即这种現代教条主义的态度，会很容易地使我們的党同群众和民族脫离，并且使我們的党不可能成为保卫群众和民族利益的战士。”艾地同志还強調說：“古典的和現代的修正主义与古典的和現代的教条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对这两者都必須不断地加以反对。这两者都是危險的，但是最大的危險就是我們不去反对它。”

四十三年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經歷了一條漫長的、曲折的和光榮的斗争道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路綫正确、團結一致、密切联系群众、富于战斗力和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它堅強地站在印度尼西亚

人民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并显示出偉大的、模範的先鋒作用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它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中的威信和影响日益增长，并且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支堅強队伍，它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具体革命实践成功地結合起来，为丰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論宝庫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現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成为資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共产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党之一，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威望正在与日俱增。

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中国人民一向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我国人民解放台湾和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主張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我們两国人民有着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经历。我們两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和万隆會議十項原則的基础上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亚非团结的共同事业中，两国人民的互相支持和合作日益加强。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起。



充分发挥铁路运输业支援农业的作用

· 吳 众 ·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联系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纽带。铁路一方面把农村提供的农产品运往城市，一方面把工业部门提供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运往农村。它通过旅客和货物的运输，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城市和乡村联系起来，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其他行业面向农村的时候，铁路部门的工作，也必须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大力支援农业，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一，把支援农业的运输放在重要地位，全面安排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业必须把支援农业的运输放在重要地位，是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我国农村是一个由五亿多农民组成的、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的广阔的国内市场。随着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的贯彻执行，随着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工作的广泛开展，我国农业必将有更大的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也必将出现新的高涨。在这种新形势下，农业为工业和城市提供的商品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劳动力将愈来愈多，农村所需要的工业品也将

愈来愈多，城乡物资交流将日益活跃。这样，就必然对铁路运输提出新的要求，铁路部门支援农业的作用也会愈来愈显著。

大力支援农业，也是铁路运输业本身发展所必需。从我国铁路货运量历年来的变化情况中，大体可以看出，上一年农业收成较好，农业产值增长较快，第二年铁路货运量就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不仅因为农业丰收直接带来了农产品运量的增多，而且还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的活跃，从而带来了铁路货运量的增长。

不仅铁路运输，而且铁路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同农业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铁路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革的发展，要求相应地扩大铁路网，不断地用新技术改造原有铁路；同时，农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的发展，这就给铁路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铁路部门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坚决地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把支援农业的运输放在重要地位，积极支援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这是铁路部



門的光荣任务，也是铁路建設蓬勃发展的自由之路。

铁路运输业必須把支援农业的运输放在重要地位，但是，并不是說就可以忽視工业运输的需要。铁路部門必須对铁路运输进行全面安排，恰当地处理农业运输同工业运输的关系。铁路是为整个国民經济服务的，強調铁路运输大力支援农业，正是为了更好地为整个国民經济服务。随着工业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軌道上以后，支援农业的工业品就会大大增加，铁路部門应当把这些工业品的运输放在重要地位。同时，对于其他工业品的运输，也要进行合理的安排，否則，就会影响工业生产的发展，其結果就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利于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所以，当铁路运输业把支援农业的运输放在重要地位的同时，仍然要十分重視其他工业品的运输。

第二，恰当地处理成批的、大宗的、长途的貨物运输同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的关系。

铁路部門要恰当地处理成批的、大宗的、长途的貨物运输同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的关系。铁路运输是整个社会运输的一个环节，它同其他运输有合理的分工，一般地說来，铁路部門担負的是成批的、大宗的、长途的貨物运输任务；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任务，主要是由其他运输部門担負的。但是，铁路部門也要适当地担負起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任务。这是农业对铁路运输业的要求。因为铁

路絕大部分处于农村，农业为城市和工业提供的农产品，多半是分散的、零星的物资，运程較短。因此，铁路部門对于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应当予以适当的重視。

物资运输的过程，就是物资从分散到集中、从集中到分散的过程。所謂大宗物资，大都是由零星的物资集中起来的；零星的物资，又大都是由大宗的物资分散开来的。比如，农业提供給城市和工业的农产品，要从广闊的、分散的农村集中起来，集零为整；工业为农业提供的工业品，要从城市分散到农村，化整为零。尽管铁路运输同其他运输有分工，但是，在铁路运输中，把成批的、大宗的、长途的貨物运输同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截然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铁路部門既要重視整車运输，也要重視零担运输；既要办好长途运输，也要办好短途运输。在客运方面，为了铁路沿綫农民乘車的方便，不仅要重視长途的直通旅客运输，也要重視短途旅客运输和市郊旅客运输。

至于用铁路来运输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是否符合經济原則，这要看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目前，我国农村的汽車和輪船等現代化运输工具很少，主要运输工具是人力車、畜力車和木帆船等。这些运输工具运力較低，远不能滿足短途运输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铁路担負一部分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任务，就能够更好地滿足农业生产的运输需要，促进农业的发展，这样，就可以減輕农村短途运输的



負担，把节省下来的运输力投入农业生产。此外，铁路的运输速度较快，可以缩短运输时间，加速物资周转。从这个意义来说，是符合经济原则的。

第三，正确地掌握计划运输和合理运输的原则。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铁路运输是计划运输。我们必须坚持计划运输的原则。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生产不够稳定，常常会出现许多预料不到的情况。同时，我国农业在现阶段主要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它同全民所有制的工业相比，计划性要差些。这些，都给实行计划运输带来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片面地强调铁路的计划运输，而不考虑农业生产的特点，对农业物资的运输计划要求过高，对计划外的农业物资的运输控制得过严过死；也不能认为只有工业物资才能实行计划运输，农业物资就不可能实行计划运输，因而，也就可以不要农业物资的运输计划。应当看到，尽管农产品不像工业品那样集中，但是，通过国家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它是可以纳入铁路运输计划的。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对农业物资的运输还缺乏经验，更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农业物资的计划运输问题。一方面要积极地进行货源的调查工作，摸索农业物资的运输规律，积累经验，尽可能地把农业物资的运输纳入计划；另一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对农业物资的运输计划放得宽一些。

合理运输也是铁路运输业必须坚持的一

个重要原则。根据国家的经济布局和各种时期的物资运输政策，把产、运、销更好地结合起来，克服物资运输中的不合理现象，是铁路部门必须经常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既要遵守合理运输的原则，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有些物资的流向，从局部地区的情况来看，是不合理的，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则又是合理的。有些有传统供销关系的物资和自产自销的物资的流向，往往同一般规定的物资流向不一致；有些农村需要的物资，在运到省、专区、县以后，还要进行再运输。如果把一切不完全符合物资流向规定的运输，通通看成不合理的运输，加以严格限制，那末，对于支援农业显然是不利的。为了坚持合理运输的原则，而又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就应当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结合具体情况，对于物资流向的规定，实事求是地不断地加以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性的物资流向和地区性的物资流向，在铁路运输中得到合理的安排。

第四，正确地对待铁路运输效率问题。

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和满足工农业生产的运输需要是一致的。努力加速机车车辆的周转，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农业物资的运量增长以后，铁路中间小站的工作就会忙碌起来。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就要多开一些在沿途装卸的零担列车和混合列车，适当地延长列车在中间小站的停车时间。有人认为，这种情况同提高铁路运输效率是矛盾的，要支援农业，就不能提高铁路运输效率，要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就会



影响对农业的支援。我们认为，把运输需要同提高铁路本身的运输效率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离开了运输需要，孤立地追求铁路运输效率，是没有意义的。铁路部门既要大力支援农业，又要努力提高运输效率。不能说支援农业就一定会降低运输效率；也不能认为只要服从农业的运输需要，就可以不讲求铁路本身的运输效率。因此，铁路部门在满足工农业生产运输需要的前提下，应当改进运输组织工作，节约铁路运输力。不能不顾实际需要，片面地追求铁路的技术经济指标，也不应当借口支援农业，不注意提高铁路运输效率。

第五，重视中间小站的工作。

过去，铁路运输的业务量大部分集中在大的客货车站，大多数中间小站的业务量很少，有的甚至不办理客运和货运业务。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以后，中间小站的客运和货运量必将显著上升。沿线中间小站同农村的联系很密切，农业物资的运输大部分要通过中间小站。在支援农业的运输工作中，中间小站起着重要作用。这些车站工作的好坏，对铁路运输业支援农业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除了继续重视大站的工作以外，当前，十分需要重视中间小站的工作，尤其是要重视靠近农牧业高产区、经济作物产区和农业技术改革的重点区的中间小站的工作。铁路部门领导机关要派得力干部帮助中间小站工作，积极地提高中间小站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逐步建立和健全客运、货运和行车等方面的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同时，要

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地逐步地给中间小站增添必要的运输设备，以适应支援农业的运输需要。

第六，铁路网的建设，既要适应工业、国防和城市的建设需要，又要适应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革的需要。

铁路部门在选择新建线路时，既要考虑通过城市和工矿区，也要考虑靠近粮棉高产区和畜牧产区。设置车站的地点，既要照顾到各区间通过能力的均衡，还要在可能条件下尽量靠近居民集中点。铁路同地方水陆交通的衔接，既要便利工矿物资的搬运，也要便利农业物资的集散。车站客运和货运设备的设置，既要考虑大站和工矿车站的需要，还应当考虑中间小站的需要。在勘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应当注意节约农田和劳动力，照顾农业的水利排灌和农村交通。线路、站场和工厂的建设，都应当注意节约用地，尽量少占用农田和好地。分期修建的工程，要分期征用土地，避免过早占用土地。线路穿过农村交通要道的地方，要根据地形来设置行人、车辆和牲畜通行的交道口。总之，在铁路建设工作中，一方面要考虑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力求技术合理，讲求投资效果，考虑施工方便，妥善地处理铁路同农业的关系，尽量照顾农业生产、农业技术改革的需要和农民的利益。

在铁路建设方面，还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修建一些地方简易铁路。简易铁路造价低，用材少，施工易，修建快，运输能力比汽车和马车大，运输成本比汽车和马车低。



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短途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有计划地修建一些地方简易铁路，对于支援农业是有好处的。

第七，适当地制造一些适宜运输农业物资的机车车辆。

铁路机车车辆的类型，应当同客运、货运任务和货物的品种相适应。在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以后，不但铁路运量会增加，而且铁路承运的货物品种、特别是农副产品的品种也会增多。根据这种新的情况，应当对铁路运输的牵引动力和主要运输工具进行技术改革。例如，在机车生产方面，除了要改造现有蒸汽机车，试制生产大马力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以外，还可以考虑设计制造一些适宜短途行驶的小马力内燃机车和内燃摩托车组，以适应零担列车和短途客运、货运列车的需要。在车辆生产方面，也要设计试制和改造一批适合于农业物资运输需要的货车，以及适宜于旅客短途乘坐、上下方便的客车。

第八，进一步扩大协作范围。

运输过程的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它要求产、运、销各个环节全面协作。铁路运输业在大力支援农业以后，协作的范围也就更加广阔了。为了加强农业物资运输的计划性，为了使铁路运输同其他运输更好地衔接起来，及时地运输和集散工农业物资，铁路部门在继续加强同矿山、工厂、港口运输协作的同时，还有必要同农村人民公社、国营商业部门、供销合作社以及地方交通部门加强联系，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和发展新的运输协作关

系。此外，铁路部门还可以派遣技术人员到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技术指导，帮助农村培养技术人材等等。

第九，把支援农业和全面提高铁路的企业管理水平结合起来。

铁路企业应当根据铁路运输的需要和支援农业的要求，相应地加强和改进计划管理、技术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并且整顿有关的规章制度。这是铁路部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把铁路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铁路部门应当积极地进行技术革新，改善劳动组织，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力，大力支援农业。

总之，铁路部门应当从各方面支援农业。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的技术改革，有利于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事，铁路部门就应当做，而且要坚决地做。

铁路是现代化的运输工具。面对着广大的、正在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农村，如何更好地发挥支援农业的作用，对铁路部门来说是个新的课题。以上意见，也还需要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和充实。这就要求铁路部门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农业技术改革的情况，农业的产、运、销的情况，货物和旅客的流向以及地方交通运输的情况等，逐步总结一套符合支援农业要求的铁路工作经验，以便把支援农业的工作做得更好。



可贵的革命干劲

中共湘潭地方委员会

毛田*，解放前叫作“茅田”。它在湖南省岳阳县东部的大云、相思、铜鼓三座大山之间，是一个极为穷僻的山区。境内荒山秃岭连绵起伏，在总面积二十万亩山地中，解放时只有五万亩残林，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全区有耕地五万多亩，大多数是在山塝上，丘块小，很多田是“人下田，牛上塝，蓑衣斗笠盖丘半”。水利条件和土质都很差，许多田靠天下雨，半数以上的田被称为“夜干丘”，“米筛田”。解放前，在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剥削下，大多数农民过着极贫苦的生活。即使是丰收年成，也是以红薯当主粮。

解放以后，毛田的面貌一天天地在变化。特别是自一九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以来，这种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大。正如这里社员们所说的，“生产年年好，生活步步高”。一九六二年，全区粮食总产量已达三千二百万斤，平均亩产六百九十斤，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九五八年，增产了百分之二十八。过去这个地方没有种植棉花的习惯，经过近年来的种植试验，社员已经逐步取得种植棉花的经验，打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这样一种说法：“茅田山内莫种花，十家种花误九家，种了花来不结果，结了果儿不炸花”。到一九六二年，全区已经种棉花达一千八百九十亩，收获皮棉近六万斤。油料、生猪等生产

也相应地得到发展。一九六二年，产油十万零五千斤。田塝上种的大豆收了一百二十多万斤。生猪，发展到一万八千头，年底存栏一万三千多头，每户平均一点二头。全区林业生产也很出色。几年来，造油茶林一万二千多亩，杉树一万零一百亩，茶树一百二十四亩，楠竹二十五亩。栽种梨、桃、橘、苹果等果树十四万一千株。南冲人民公社八斗、水圳两个大队，在一九五九年移栽的二千八百株梨树，去年已经开花结果。同时，对五万亩残林，实行了封山育林，禁止随便砍伐。山区交通，也有了改善，修筑了五十华里的公路。此外，还建成了一所水力发电站，使南冲一带四个大队的五百户社员，有了电灯照明。随着自然条件的改变，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集体经济日益巩固。社员们称赞“人民公社是铁桶江山，集体经济是金边饭碗”。

立志不作自然的奴隶

毛田区面貌的改变，决不是偶然的。最主要的是由于毛田区的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

- * 毛田区现有四个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以后，这个地方曾一度撤销区的建制。



面紅旗，鼓足革命干劲，立志不作自然的奴隶，建設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个地方怕暴雨，更怕干旱。正如社員所說的“一場大雨一层沙，一月无雨干死蛇”。那些沙田沙土，像米篩一样，即使灌一点水，或者下一点雨，不到一个隔晚就漏干了。虽然有些塘壩，但数量少，面积小，蓄水不多。解放前，也有人想多修塘壩，改善水利，可是那时候地主只管收租，农民衣不遮身，食不糊口，无力多办水利。碰到干旱，常开坛立醮，求神拜佛，把希望寄托于“天老爷”。

解放以后，农民翻了身，組織起来，依靠集体力量 and 国家的支援，陸續修整了一些小塘小壩。一九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干部和群众改变山区面貌的願望更加强烈，建設山区的条件也比以前更为有利。公社党委根据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需要和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运动。公社党委的领导干部都分头深入到干旱严重的地方，帶領群众兴修水利。在龙形寺的一个地方，有二十多亩田，沒有水源，三年两不收。多少年来，群众把这个地方喊成“和尚嘴”。大队党支部和在这里工作的公社干部，同群众一道想办法，找水源。有的老农說：“水源是有，但隔了一座石山，不能过来。”公社干部随即同大队党支部书记、社員一同去察看。經過反复商量比較，一致认为，要解决“和尚嘴”的水利，只有穿山凿石，引水过山。这个消息傳开以后，大多数人积极贊成，也有少数人說，“凿石穿山，是蛤蟆想吃天鵝肉，根本做不到”。公社干部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一方面启发教育群众，一方面亲自帶領四个积极分子，挖山凿石。干

了几天，鋤头挖卷了口，手上打起了泡。一些好心腸的人就来劝阻，原来一些不同意的人，就說起風凉話来了。党支部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他們坚信石山可以凿穿；但是，工具需要改进。于是，請来了铁匠，在山上架起了紅炉，为凿石穿山整修鋼钎。他們頑强地挖凿石头，鋼钎磨钝了，又回炉。广大社員被他們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自动找来輪流换班，先后参加凿石穿山的有一百多人。經過二十天的艰苦劳动，终于把难办的事情办成了，凿开了一条十丈多长的石渠，引来了隔山的溪水。“和尚嘴”的二十多亩田，从此变成了自流灌溉田。

几年来，全区的干部和群众，就是以这种飽滿的革命干劲和“要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战斗精神，新建了二十多个小型水庫，整修扩建了四千多处塘壩，使全区二万六千多亩“夜干丘”、“米篩田”，变成了水旱无忧的好田。另外，还使一万多亩田，增强了抗旱能力。有人編了这样一首歌謠，来歌頌水利建設的胜利：“旧社会里逢旱年，农民心內似油煎；既求蒼天又拜佛，求神不雨泪漣漣。如今遇到干旱年，不求神佛不靠天；凿石穿山修水利，农民自己作神仙。”

毛田区在抓治水的同时，又抓改良土壤，全面开展了改造低产田的群众运动。南冲的高家坳到黄土庄一带，共有三百七十亩低产田，一般都是两三丈高的陡壩，荆棘丛生，遮了大半边田。这些田又大多是青夹泥、死黄泥、澄沙田，犁不深，耙不烂，总是长不起好禾来。有人称它为“十里荒”。一九五九年冬天，当时的公社党委經過討論之后，决定发动社員把这些坏田改造成为好田。于



是，由公社党委书记带头，同干部、社员一起，来改造“十里荒”。他们锄光了杂草，挖掉了菟根，在青夹泥、死黄泥田内，掺淤沙，下肥土，施家肥；在澄沙田内，放塘泥，掺黑土。经过艰苦的努力，“十里荒”变了样。公社党委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十里荒”变样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不少人来现场参观学习，推动了全区改造低产田的群众运动。在自然条件很差的寸家山，有一个老年社员刘月凡，原来一提到改造低产田，就摇头摆手地说：“生成的瘦田改不好，生成的矮子长不长。”他参观了“十里荒”以后，得到了启发，后来，成为改造低产田的积极分子，主动向队干部建议改造大沙坡的四点五亩低产田。队干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发动全队社员把田面上的一层粗沙搬走，又从塘内挑来了塘泥，铺上了两三寸厚的泥土。同时，整修好了一口废塘，彻底改变了大沙坡的面貌，种上的双季稻，获得了亩产八百多斤的丰产。经过三年多来的艰苦斗争，全区共改造了低产田五千一百多亩。同时，全区还进行了水土保持，控制了水土流失，减轻了沙灾的危害。

满腔热情 脚踏实地

毛田区田少人多，如何增产粮食，是摆在干部和群众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区委多次研究，认为除了改良水利条件和土质，以及适当地扩大耕地面积以外，还可以种植双季稻。可是，这里没有种植双季稻的习惯。在一九五五年，区委根据群众增产粮食的要求，最初提出种植双季稻的时候，在

干部和群众中，有的赞成，有的主张试试看，有的怀疑或反对。怀疑或反对的人说：“山高水冷，五月栽禾九月扮，能种双季稻吗？”“山里搞一季稻，是生成的眉毛长成的痣，改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区委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从种试验田作起，摸索经验，作出样子，再逐步推广。于是，区委书记便到水庙坳串连发动了几个积极分子，选择了一丘土质、水利、阳光较好的坡上丘的一亩一分田作试验。他们下了八十担肥料，犁耙了五次，自己栽插秧苗，细心培育。秋后，每亩收获稻谷八百多斤，比邻近的单季稻多收了三百多斤。这一年，在区委领导干部的影响下，全区的各级干部也多多少少种了一些双季稻的试验田，一般都获得成功。第二年，区委就提倡社员在有条件的地方种植一些双季稻。但是，有少数干部忽视自然条件，没有很好地同群众商量，在一些不适合种植双季稻的地方，也种上了双季稻，秋后有一部分晚稻失收。区委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群众的意见，强调种植双季稻必须因地制宜，绝对不能“一刀切”、一律化。种植双季稻必须考虑全年平均温度、无霜期、雨量、日照、土质等自然条件是否适宜，还必须考虑水利、肥料、劳动力等条件是否具备，同时，对于实际经济效益也要全面考虑，作出具体的安排。在不具备以上这些条件、不适合种植双季稻的地方，就不种植不推广。

经过几年来的试验和推广，到一九六一年，全区已经因地制宜地种植了一万九千三百亩双季稻。双季稻种得多的生产队，粮食产量都有较大的增加。那些条件大体相同的



生产队，看到多种双季稻能够多增产粮食的事实，都表示要在来年再适当地扩种双季稻；有些自然条件较好的生产队，更感到少种双季稻是个损失。一九六二年春天，全区根据可能，在有条件的地区，又增加了种植双季稻的面积。经过区委和各公社的干部，分头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同社员商量，逐丘调查，逐丘规划，由下至上制订了扩种计划。一九六二年全区插上的二万四千一百亩双季稻，获得了平均亩产六百五十九斤的丰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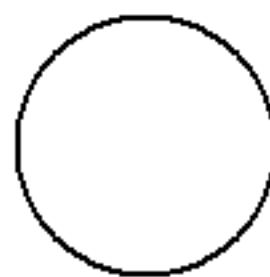
毛田区的干部就是这样满腔热情地对待新鲜事物，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经过试验因地制宜地逐步推广，脚踏实地前进，使双季稻在毛田区落脚生根。

取经学艺 四上云山

毛田区荒山秃岭多，森林竹木少。解放以前，人们也曾有过改变穷山的愿望。但是当时只能是愿望。只有解放了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无限的创造力。根据这个地区的特点和群众的愿望，要全面发展生产，有计划地改善人民生活，在大抓农业生产的同时，必须向荒山进军，把比耕地面积大三倍的荒山开发出来，把毛田地区变为一个新型的林区。一九五九年冬天，经过当时的公社党委研究，由党委书记等带领了一批社员，到冷山作造林试点。他们在冷山开了誓师大会，立誓要把冷山变为林海，为全区改造荒山秃岭树立榜样。他们冒着严寒，披荆斩棘，开垦了几百亩荒山，播种了油茶。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原来所想像

的那么顺利。由于缺乏在荒山造林的经验，冷山造林暂时失败了。这不仅使当地造林工作受到了影响，而且给全区造林运动增加了阻力。

在开发荒山受到挫折的时候，是放弃建设山区的理想，向困难低头呢，还是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呢？公社党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要关心群众的利益，要有长远打算，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于是，公社党委委员一齐上冷山，仔细地研究了土质情况，还专门召开了老农会，总结了冷山造林失败的原因：不是土质不行，主要是人们还没有荒山造林的经验。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认真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又要组织干部向外地学习。一九六一年春天，公社党委书记带领了大队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第一次爬上了大云山，到本县的国营大云山林场参观学习。经过分析和比较，他们认识到大云山的土质和冷山差不多，地势比冷山高，气温比冷山低，而栽培的杉树和果木，却生长得很好。大家扩展了眼界，初步学到了一些荒山造林经验，增强了造林的信心。原来抱怀疑态度的人，也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看法错了，一致表示要好好发动群众造林。这批干部回去以后，普遍召开了社员会议，介绍了大云山的造林情况和经验，分析了冷山造林失败的原因，分清了是非，大大地调动了社员造林的积极性。他们说：“干吧！草鞋没有样，边打边像”，“学徒不费力气，哪能学得好手艺”。一个群众性的开发荒山的造林运动，就在全区开展起来了。但到了冬天，有的人因感到造林与农业有矛盾，对造林又不大积极了。全区再一次组织干部上云山参



观学习，把毛田区的情况与大云山林场作了对比，学习了农业与林业结合的經驗。这样一来，冬季造林规划由五千亩扩大到了一万亩，实际种植了一万二千亩。可是不久，新的問題又出来了。有些地方，由于社員缺少撫育幼苗的技术和管理山林的經驗，栽下的树苗枯死了不少。针对这个情况，必須迅速帮助群众解决林木撫育的問題。一九六二年春天，便又一次組織干部，三上云山学习管理經驗。此后，全区新造的林木，都普遍进行了培育，加强了管理，大大地提高了幼苗的成活率。为了进一步給扩大造林作好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全区又組織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分成两批，四上云山学习經驗。

毛田区的干部和群众，在开发荒山的造林运动中，虽然碰到过很多困难，經過許多挫折，但是他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不屈不撓地战胜了困难；失敗沒有使他們灰心，而是认真地总结經驗教訓，并研究和學習別人的經驗，繼續前进。

高瞻远瞩 不断前进

貧穷的毛田山区，現在已經成了比較富裕的山区。最近，毛田区的干部和群众，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經濟，改变全区的面貌，又制訂了建設新毛田的远景规划。

为了保证这个远景规划的彻底实现，毛田区委在干部中进行了教育，要求他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建設社会主义新山区

的雄心壮志，不辜负党的培养，不辜负群众的期望，领导群众不断前进，做出更加出色的成績。目前，全区各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群众，正在为爭取实现一九六三年农业生产全面丰收而积极努力。全区的两万亩冬闲田，在去年年底就犁耙过两次；有的水田是一道犁耙一层粪，有的水田漚了粪迹；进行了治虫；加高培厚了田塍；春收作物也普遍加工培育了几次。去冬今春，又造林二万一千八百亩，其中果树二千一百多亩，仅梨树就近四万株。

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是战无不胜的。毛田区的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鼓足革命干劲，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就是許許多多事例中的一个。他們可贵的地方，在于有雄心壮志，有远大理想，而又脚踏实地地去干。他們对于需要办而又能够办到的事情，总是以饱满的热情，依靠集体力量，积极去办。他們在前进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畏难而退，灰心丧气，而是认真总结自己的經驗教訓，研究和學習別人的經驗，坚持真理，修正錯誤，頑强地战斗，繼續前进。他們在工作中，坚持领导带头，以身作则，坚持党的調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綫的傳統作風，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結合起来，把一般号召和典型示范結合起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的自觉进行工作。他們艰苦奋斗所获得的成績，使人相信：毛田区的干部和群众，在为实现远景规划而奋斗的过程中，将会作出更大的成績。



物理學研究中的理論和實驗

周光召

何祚庥

理論和實際相結合，是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在自然科學研究中，也必須遵循這條基本原則。實踐是認識的泉源，是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基礎，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社會實踐包括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等。人們在參加這些鬥爭中，不斷地改造客觀世界，同時也不斷地提高了自己。科學實驗是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科學研究工作應當重視和認真參加科學實踐。在參加科學實踐中，不斷擴展知識領域，提高思想認識，學會用科學的方法去從事工作，促進生產的發展。要建立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各個方面的幹部，在各項工作中，都應當用嚴格的科學態度，經過試驗，解決問題。如果我們在各項工作

中保持嚴格的科學態度，就能大大提高我們的思想水平，使我們的工作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進行得更有效。所謂嚴格的科學態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理論和實驗的緊密結合，就是理論聯繫實際這一原則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體現。如果說在早期的科學研究中，人們主要是凭借原始的經驗和簡單的猜想來摸索自然規律，那末，在科學發達的今天，沒有深刻的理論研究和先進的實驗技術的緊密結合，就不可能有效地進行科學研究。特別在現代物理學的研究中，這方面的問題更為突出。現代物理學的實驗是和理論活動分不開的，而科學理論的形成，是在實驗的基礎上實現的。因此，加強理論和實驗之間的聯繫，對於物理學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這裡，我們以物理學的理論工作者的體會，談談物理學研究中實驗和理論的相互關係問題。

一

科學實驗是人們的一種有目的的實踐活動。它借助於儀器和設備，可以在最有利的條件下研究自然現象，可以人工地改變或模擬自然現象。科學實驗的要求，一方面力求改進實驗裝備、採用先進的實驗技術，另一方面又和當時先進的理論活動有緊密的聯繫。這就是說，從事實驗工作，既需要掌握高度精細的實驗技術，又需要以科學理論為指導。

新儀器和新技術的發明和採用，常常給



实验工作的面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有时甚至开辟出某些科学研究的领域。有了新仪器，过去观察不到的现象显示出来了，过去分辨不清的东西变得清晰了，人的认识因而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由于发明了乳胶，就从宇宙射线中发现了 π 介子和一系列奇異粒子；发明了能量巨大的加速器和气泡室以后，人们就可以在实验室的条件下人工产生各种基本粒子，观察它们的相互作用和衰亡过程，这就开辟了一门发展得异常迅速的学科——基本粒子物理学。在其他科学部门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多得不可胜数，像天文学中引进望远镜、射电望远镜和行星际站等，在无线电工程中引进微波波导管、量子放大器，在生物学、医学中引进放射性示踪原子、电子显微镜等，都极大地扩展了各门知识领域，提高了人的认识水平。因此，科学工作者在实验工作中总是十分重视改良仪器和发展新技术的工作。

先进的实验设备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但是，科学研究的成果，只有在先进的科学理论的配合和指导下才能获得。实际上，在现代科学实验的活动过程中，不论是实验题目的选择，实验的构思和设计，实验方法和技术的确定，实验数据的处理，以及由实验结果而作出的科学的结论，都始终是同理论工作密切联系的。

实验题目的选择，要遵循一定的理论。科学工作是一种认识活动，它总是由不知到知，由片面到全面，由表面深入事物的本质。在认识发展过程的每一阶段上都有它的

中心环节。在科学工作中，只有遵循着一定发展线索而又确实抓住了中心问题的那些实验工作，才能真正地推动科学前进。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已发展成为规模巨大、设备复杂的集体事业，它所研究的问题也愈益深入物质构造的深处，这就要求实验研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当然，一个科学实验，只要是按照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它总能提供某些实际材料、某些数据。但是，如果科学实验脱离了理论指导，那末，它所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就不一定能说明什么问题。在现代条件下，科学实验工作是在一定的理论的指导下，按照一定的目的和任务来进行的。科学工作的进展总是通过一批实验，发现一些具有原则意义的新的现象，提出并解决理论上的某些问题，随之又通过另一批实验，发现另一些现象，提出并解决理论上的另一些问题，一步一步地深入事物的本质。假如一个实验证实了某一理论，这当然意味着人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假如推翻了某一理论，就将使人们从错误中纠正过来，这也是认识上的一种进步，有时还是一种重大的进步。这样，每当实验工作有新的成功，人的认识就有新的提高。因此，优秀的实验工作者总是抓住那些刚刚萌芽，但具有原则性意义的新事物、新现象，十分敏锐地对待现代科学发展的理论问题，并慎重地确定研究题目。

科学实验的构思和设计，也是和一定的理论分析相联系的。恩格斯指出，在一个科学实验中，已经包含着对未知对象的分析



综合。^①具体说来，在实验安排上往往要设法突出某一因素的影响，排除另一些因素的干扰，这样才能保证实验工作的准确进行。举例来说，在原子核的 β 衰变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曾经怀疑能量守恒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遭到了破坏。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必须假设一种中性的、静止质量极小(或为零)的中微子的存在。可是中微子既不带电，和物质的相互作用又极为微弱，要想直接观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如果希望通过反冲的原子核和衰变出的电子来研究能量和动量间的平衡，却又因为这是包括三个粒子的衰变过程，从而将使得它们之间的动量和能量关系变得极其复杂。为了消除这方面的困难，实验工作者便巧妙地挑选了铍原子核的K电子俘获的过程。因为在铍的K-俘获过程中，它的末态只包括铍原子核和中微子二个粒子。如果能量和动量是守恒的话，那末反冲铍原子核便具有确定的动量和能量；并且，由于铍是一个质量较轻的原子核，它的反冲动量和能量还应该较大，较便于进行实验的观察和测量。这就大大简化了实验工作，使得这个实验研究成为切实可行。进一步的实验表明铍原子在经过K俘获的过程以后，具有和理论预测相符的确定的反冲动量和能量。这就表明在这类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动量和能量是守恒的，中微子也是存在的。不难看出，上面这个实验之所以成功，就在于K电子俘获过程较 β 衰变过程更为简单，更为纯粹，因而就能够做出确切的理论结论。

由实验数据做出科学结论，是实验工作

取得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实验结果进行理论分析，常常能发掘出它的深刻的含义。历史上曾经有若干例子，表明在科学工作中有时会由于缺乏宽广的眼界，因而错过了重要的发现的机会。例如，在中子发现以前，已经有一些科学工作者测量到在中子碰撞下的质子有异乎寻常、十分大的反冲动量，并且还指出假如这个质子的反冲动量是由高能光子所引起的，那末这种光子将具有几十个以至于上百个百万电子伏特的能量，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是不可能获得的。可是由于他们缺乏物质世界中可能存在有中子这种“预想”，因而也就不能做出“这就是中子”的结论。在科学工作中，上述漏失重要科学结论的事例并不是罕见的。

在实验工作的其他环节上，如实验方法的选择，实验技术的改进，实验数据的处理等等，也都在很多方面受到理论研究的影响。总之，实验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和理论研究有密切的联系。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比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更容易深入。所以在各种科学部门内，只要有可能使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的，都应当用实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

二

在物理学的理论研究中，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由实验材料、实验数据出发而抽引出

^① 参看《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页。



理論的一般規律，另一种是着重于数学演算或邏輯证明的研究。这两种研究是相互結合的。但是，不論是哪一种理論研究，都必須密切結合实验。

为什么在理論工作中，首先要強調密切結合实验呢？因为实验材料是理論概括的基础。离开了实验材料，理論的加工就失去了对象和基础，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流”的东西。实验事实是理論研究的“空气”，离开了“空气”，理論就不能生存。任何理論只要同客观事实发生矛盾，就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理論。在科学史上，有些科学家热衷于形成某些理論观念，却不重視实验事实，結果新的证据一出，就推翻了这种“理論观念”。因此，理論工作者首先必須注意实验事实，必須使自己的工作牢固地建立在实验事实的基础上。

在理論研究中常常使用邏輯推理。邏輯推理是形成正确理論的一个必要手段。在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論中，不容許在邏輯上有前提之間的矛盾、思想上不一貫的地方。理論如果存在着这种矛盾和思想上不一貫，就意味着理論还没有能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即使这种理論能多方面地說明实验現象，但它終将为进一步的实践所充实或修正。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在門德列也夫早期的周期律中，化学元素是按照原子量递增的順序排列起来的，这样就可以发现一族一族的化学元素具有彼此相像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可是，如果将所有的化学元素严格地按照这种原子量递增的順序来排列，那

末就会出现氫和鉀等元素次序顛倒的情况，而为了使周期律的排列更能和科学实验事实相符合，于是就只好違背原来出发点，把氫和鉀等元素顛倒过来排列。显然，在这个理論中存在着邏輯前提之間的矛盾，这是正确科学理論所不能允許的。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发现原来真正决定化学元素周期性质的并不是原子量，而是原子的核电荷。化学元素周期律是应该按照核电荷递增的次序来排列的。

邏輯推理是由已知的事实和原理来探求未知的事实和原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恩格斯曾指出，“可是甚至形式邏輯首先也是寻找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辯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罢了”^①。运用形式邏輯也可能帮助发现重要的真理。在古代的希腊，亚里士多德就一直认为质量較重的物体，将比质量較輕的物体先落到地面，并认为即使去掉了空气的阻碍作用也是如此。长期以来，这个观点占居統治的地位。直到伽利略在比沙斜塔上做了一个实验，才推翻了 this 观点，并在邏輯上駁斥了亚里士多德。伽利略指出，如果把下落較快的物体和下落較慢的物体綁在一起，那末就会由于相互牵引而使得下落較快的物体变得稍慢一些，下落較慢的物体变得稍快一些。可是如果把輕重不同的物体縛在一起的話，就意味着它們是一个新形成的更重的物体了，这将下降得更快一些。这是一个矛盾。因此，对于輕重不同的物体就只能认为它們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9頁。



是以同样的速度落到地面。^① 我們不清楚伽利略究竟是先从邏輯上推出这个結果，还是先从实验上证明这个結論的，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邏輯推理确为发现真理提供綫索。所以，在物理学的理論研究中，总是把对实验材料的分析和綜合，数学的演算和邏輯的推理統一起来。

邏輯推理在理論研究中虽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真正推动理論发展的却仍然是实践。历史上有不少“言之成理”、“自圓其說”的理論，却常常为科学实践所拋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理論是和实践不符的。形成科学理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邏輯上的无矛盾性、思想上的一貫性等等。但是这些并不是形成一个科学理論的决定性的条件。只有实践才能判明理論是否正确，只有实践才是形成正确理論最根本的条件。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有时一种理論和大量的实验事实相符合，但是在某些个別的地方仍然包含若干邏輯上的矛盾。这种理論不仅是允許的，而且在科学上也是有价值的。因为这种理論在邏輯上的缺陷是局部的，而它的主要内容却是正确的。当然，在理論中包含有邏輯上的矛盾总是意味着理論不能全面地符合实验，理論还不是十分完善的。作为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論必須是全面地符合实验，邏輯上无矛盾的。

在理論研究中，不能单纯凭借邏輯推理。邏輯推理只能以一定的实验材料为对象，对一定的实验材料进行加工。它不能凭空“創造”出科学事实。当人們掌握的实验資料十

分有限的时候，邏輯推理所能活动的范围也就十分有限。尽管牛顿力学已形成了严密的体系，但是，单凭邏輯推理仍然推不出电子和原子运动的規律。只有依靠大量的原子物理的实验，才能总结反映出电子、原子运动規律的量子力学。在科学上比較成熟的部門，如流体力学中，当雷諾数增长到一定限度以上，流体的运动就发生突变，由层流变成湍流。湍流带有随机的性质，它遵循力学的和統計的規律。单纯凭借牛顿力学进行邏輯推理是不能得到湍流的規律的。事实上，层流向湍流的过渡以及湍流的規律就不是从理論上首先預見的。

由此可見，在科学理論研究工作中，必須十分重視掌握实验材料，单纯使用邏輯推理来从事科学研究，总带有較大的局限性。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上，重大理論的发现，都是密切地結合实验研究的結果。

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多数有成就的理論物理学家，总是用相当大的精力来从事对于实验資料的分析、綜合的工作，以相当多的力量来解决实验工作中的一些問題。理論工作者只有在长期和实验材料打交道的过程中，吸取新的营养，新的智慧，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論。

理論工作者还应当承担国家社会主义建設的任务，运用某些基本的理論去解决实际問題。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对每一門新的尖端学科的基本原理的探索到实际应用，并没

^① 参看伽利略：《关于两个新科学的對話》，麦克米倫公司1914年英文版，第62—63頁。



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往往在发现了一种新的现象，掌握了它的基本规律以后，也就很快地找到了它的应用价值。对一门学科来说，当人们发现它具有应用价值时，它便能获得新的生命力，从而迅速地发展起来。一九三二年发现中子，一九三九年发现铀的裂变现象，而在一九四二年第一个反应堆就开始工作了，从而开辟了原子能的新时代。因此，科学工作者在研究基本问题的同时，应当努力探索科学成果的应用价值。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他们都是既从事本门科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又多方面地涉及实际问题的研究。像原子能这种尖端科学技术，就是在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工作者参加实际工作，不仅对实际工作有很大帮助，而且还能促进理论工作的发展，开辟新的理论领域。像控制理论发展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三

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对象是共同的，它们的任务也是一致的。但是，它们所采用的研究工具，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不同的。因此，理论和实验还有相互独立，有时甚至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在物理学研究工作中，必须加强理论和实验之间的联系，同时又必须正确地解决理论和实验之间的矛盾。我们既不能为了强调理论和实验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而削弱甚至取消它们之间的联系；又不能因为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忽视它们各自具

有的特点。理论工作者只有具备先进的思想观点，严密的推理和准确可靠的计算方法，才有可能提出和解决关键性的问题。而实验工作者只有掌握精确可靠的实验技术，巧妙的实验构思和设计，才有可能发现关键性的新的现象，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才有可能检验和修改理论的前提和假设，提出新的理论问题，促进理论工作的发展。在物理学研究工作中，几乎是每一个重大科学问题的解决，都是在理论工作和实验工作密切配合，互相促进的情况下取得的。只有实验才能发现新的现象，帮助发现这些现象所遵循的基本规律；只有依靠理论才能发掘现象间的本质联系，预测新事物的出现。这两者总是互相补充的。当然，在不同的问题中，有一些问题的解决，理论工作起着主要的作用，另一些问题的解决，却由实验工作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如果彼此不密切配合，就不能得到最后的解决。

举例来说，在基本粒子的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现有形式下的“微观因果条件”是否成立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研究由“微观因果条件”引伸出的逻辑的推论，导出了所谓“色散关系”。“色散关系”是基本粒子相互碰撞截面所满足的一个积分关系式，它的正确性是可以由实验来直接检验的。我们说实验证实了“微观因果条件”，实际上只是说实验测量出的截面满足“色散关系”的要求，而由“微观因果条件”到“色散关系”，却是一个纯粹逻辑推理的过程。这个推理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它应用了泛函分析、多元复变函数这



样复杂的数学工具。如果理論上不发展一整套极为抽象的数学方法，不能严格证明“色散关系”是“微观因果条件”的必然推論，那末就无从用实验来檢驗“微观因果条件”是否正确。应该說，在这个問題上理論是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如果在实验工作上不发展一套测量截面的技术，也无从最終地配合解决这个問題。

又例如，理論在分析 μ 介子的輻射衰变現象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迹象表明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中微子。理論上看来有可能存在，但不一定存在。这只能由实验来加以判明。但是，要从实验上证明这一点却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只有在能量特別高、粒子束流特別强的高能加速器上，采用特殊設計的探测仪器——火花室，才能从实验上证明两种中微子的存在。显然，在这个問題上，实验技术的发展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理論上的指引，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实验上的任务。

在現代物理学研究中，必須把实验装备革新的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在科学先进的国家的实验室中，十分重視发展新的实验方法，設計新的实验仪器。这将投入較多的人力、物力，而实际上将更快地促进科学的发展。世界各国优秀的实验工作者总是积极从事实验基地的建設工作。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实验基地，就不可能期望在实验上和理論上取得多方面的成就。

現代的科学实验常常是一种規模大、耗資多、費时长的工作。这种科学实验的規模

之大、耗資之多，已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所謂实验室規模了。这种科学实验設備的建立就是一个現代的工程技术問題，而有些甚至是只有用国家力量才能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实验题目选择得正确与否成为十分重要的問題。只有那种实际意义和科学价值較大，原則意义較强的题目才值得消耗这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了能够从实验結果中得到科学結論，必須大力开展理論研究工作，以便事先从理論上探討各种实验方案的优劣，比較各种理論模型和图像，找出为进一步的認識所必需解决的关键性問題，圍繞这些問題建議恰当的实验研究課題。由于开展这种理論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人力、物力都較少，而获得的結果却可能很大，因而提倡理論研究，使事先的理論分析做得透彻一些，也是有利于科学实验的。

共同的对象和共同的任务是理論工作和实验工作互相联系的基础。互相联系的形式应当有利于共同任务的完成。一般說来，理論工作应当綜合实验的結果。分析实验的条件，对实验工作的方向提出意見，并建議重大的实验課題；实验工作应当檢驗假說和理論的前提，发现重要的現象，由此提出新的理論課題等等。可是，理論和实验还有相互矛盾的一面。理論研究常常要撇开許多次要的因素，要在理想的条件下把握和发掘一些基本的更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它是从实验材料出发，但又不是只从个别的实验材料出发，而是要从大量的实验材料出发。在研究方法上，它要由具体到抽象，經過抽象这一环节，再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实验总是以具体事物为对象，它是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进行工作，受到物质技术条件的制约。实验所研究的是各种具体事物在不同条件下的运动和变化，因而由实验所提供的现象常常较理论更为生动、复杂、丰富和具体。因此，理论工作和实验工作常常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

为了促进理论工作和实验工作的联系，理论工作者在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应当多了解一些实验工作的条件，实验测量所依据的一般原理，实验仪器的准确度以及现代实验所达到的技术水平等是有必要的。同样，实验工作者在从事实验研究的时候，了解理论发展的主要思想和物理图像，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它的主要结论，以及大略的推理过程等也是必要的。但是，就一般物理学的情况来说，理论工作者无需去直接从事实验，了解实验技术和实验操作上的一切细节，这是实验工作者的任务；同样的，也不能要求实验工作者熟练地掌握理论计算的数学技巧和推理过程中的细节，这主要是由理论工作者来加以解决的。此外，也没有必要把理论工作和实验工作的项目和题目都安排得完全一样。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在科学工作中出现这种分工是完全必要的，这是自然科学的一种进步，有助于深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因为现代的物理学已经发展成为十分庞大的体系，任何人都不能精通物理学所有的部门。随着自然科学分工的发展，往往出现了不同领域间的“分割”，这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的。但是解

决这种“分割”的办法，不是去取消它们之间的分工，而是要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理论工作和实验工作中，都可能出现个别的错误。经验表明，在现代的科学文献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包含有错误的实验报告，如果理论工作者根据错误的报告来进行工作，那末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同样，在现代科学文献中有时也会看到这样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中可以包含着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参变量。这种“理论”的“弹性”是如此之大，以致在今天他们预言将出现某一种实验现象，而到了明天当实验推翻了他们的预言以后，这种“理论”将参变量重新调节了一下，于是又能解释新的实验事实了。显然，如果实验工作者相信了这种“理论”，并根据它们来进行工作，就会一无成就。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实验工作者将实验结果任意处理，使它和上述这种“理论”相符合。同样，有些理论工作者也喜欢在他们的计算中任意舍去这一项或那一项，轻率地宣称那些因素是不重要的，从而他们的理论计算也就和实验结果相一致。应该说，这种做法根本就不能称为科学工作，这不是严肃的科学工作者应有的作风。实验和理论之间如果不相符合，我们应当按照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才有可能获得新的成果。

总之，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必须大力加强理论和实验之间的联系。这样，就能够使理论不致成为空洞的理论，使实验不致成为盲目的实验，更好地共同解决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

郑言实编

十三 为实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必须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迫害和镇压，机会主义者的“国内和平”的说教，都阻止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革命危机，首先在俄国爆发了。列宁亲手培育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大战期间坚决抵制了社会沙文主义的腐蚀，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早就按照列宁的路线作了充分准备，因而成功地实现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布尔什维克领导劳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工兵苏维埃。但是，正当布尔什维克在街上领导群众对敌人进行战斗的时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却趁机涌进了苏维埃，在苏维埃中占了多数，同时又和资产阶级勾搭，建立了临时政府。这样，从革命一开始便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从根本性质来讲，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工兵代表苏维埃。

列宁知道了二月革命的消息以后，急如星火地准备回国，以便直接领导已经开始了的俄国革命。在还没有动身的时候，他就连续写了很多信，指示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群众一定要把革命推向前进，并且一定要保持党的独立性，一定要按照革命的方式进行全部工作。列宁在三月十七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当前的任务是开展工作、组织群众、唤醒新的落后的农村阶层以及僕役阶层，在军队中成立支部，以便对新政府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揭露，以便准备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夺取政权。”“现在要消灭反动派，丝毫不信任不支持新政府（丝毫不信任克伦斯基、格沃兹迭夫、契恒凯里、齐赫泽之流），武装起来等待时机，武装起来为更高阶段准备更广泛的基础。”^①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在群众的欢迎会上，列宁用“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来作为他的演说的结束语。第二天，列宁提出了有名的《四月提纲》。这个提纲回答了俄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制定了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路线。《提纲》指出，二月

^① 《给亚·米·柯伦泰》。《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1页。



革命后临时政府所进行的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要摆脱战争，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所以不能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而是要使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提纲》明确地向布尔什维克和全国人民提出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列宁写道：“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和组织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①

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普列汉诺夫发表文章说：“现在，我国某些人……号召俄国劳动群众夺取政权，但夺取政权只有在进行社会革命所必需的客观条件业已具备时才是有意义的。目前，这许多条件还不存在”^②。一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机会主义分子都没有收起这种滥调：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③，无产阶级“不能开动国家机关”，“环境非常复杂”，“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④，等等。这些言论，无非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理論在俄国的翻版，他们把马克思针对十九世纪情况提出的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单独胜利的个别原理，奉为教条。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像鸚鵡学舌一样，说什么在落后的俄国尤其不能单独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二月革命以后，列宁写了大量著作，系统地驳斥了机会主义者反对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陈腐理論。列宁说：如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夺到了政权，那末它就能保证获得胜利，因为支持我们的有无比广大的世界无产阶级力量。尽管整个资本家阶级一定会进行最顽强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可以用组织全体居民参加苏维埃的方法来粉碎。至于无产阶级能否开动国家机器问题，列宁指出：只有在掌握了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才有条件去学习管理国家的本领，他们也一定会通过实践学会管理国家。“现在最主要的是抛弃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仿佛只有那些按整个社会地位来说完全依附于资本的特殊官吏才能管理国家。”^⑤ 列宁在驳斥“环境非常复杂”论时指出：“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就是旧东西死亡的无比复杂而痛苦的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生活方式的产生。”“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末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树林里去。”^⑥

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⑦ 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① 《論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第2頁。

② 轉引自《根本問題之一》，《列宁全集》第24卷，第165頁。

③ 轉引自《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6頁。

④ 轉引自《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列宁全集》第26卷，第92、100、102頁。

⑤⑥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列宁全集》第26卷，第96、100頁。

⑦ 《論两个政权》，《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頁。



的过程。国家同拥有无限权力的资本家集团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成为“囚禁工人的军事苦工监狱”。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显著发展、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国家学说进行严重歪曲的时候，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又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机器，就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上最迫切的问题了。对这个问题，列宁早在侨居瑞士的时候，就进行了充分的理论上的研究，作了大量的笔记。回国后，列宁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写成了《国家与革命》这个马克思主义巨著。这个著作透彻地回答了革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保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中的历史作用，对机会主义者特别是考茨基作了无情的批判。

考茨基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现在谈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怎样的形式”，而是“应该怎样去改变现在的国家”。他说：“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①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总结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实际经验，严密地论证了这个原理：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是他所完全不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②列宁认为，必须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己的统治。由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提供的苏维埃，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他说：“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会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命反抗、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统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③

列宁在这个著作里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他彻底揭穿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他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民主共和制度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可靠十分巩固地确立自己的权力。“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机关或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⑤

① 转引自《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65、472、476页。

②③④⑤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3、391、400、380—381页。



列宁批判了考茨基“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的论点。列宁说：“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①考茨基的这种观点，一点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范围。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压迫、镇压人民”^②。列宁后来指出：“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③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特别着重地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因为机会主义者对这一点是“照例不谈、甚至照例不想的，在群众中进行的日常鼓动宣传中也不占任何地位”^④。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三十年以后，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表现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迷恋’，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⑤

为了掩饰自己向资产阶级国家献媚的丑态和对暴力革命的恐惧，考茨基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只空谈反对无政府主义，避而不谈反对修正主义，并且恶意地混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严格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同时也就粉碎了机会主义诬蔑马克思主义的无耻企图。列宁说：“（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成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⑥

①②④⑤⑥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6、409、386、387—388、471页。

③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页。



但願和平地取得政权，可是資產階級不会自願退出历史舞台

二月革命后，俄国局势的特点是两个政权同时并存：除了資產階級临时政府以外，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政府——工兵苏維埃。这种局面是不能长久維持下去的，事变进程要求全部政权集中到某一方面：或者是集中到临时政府手中，或者是集中到工兵苏維埃手中。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在《四月提綱》中提出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計劃。对于临时政府，列宁提出的口号是：“不給临时政府以任何援助！”列宁指出，要經過布尔什維克的艰苦工作，使群众相信，苏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全部国家政权都应当轉归苏維埃。因此，必須把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維埃中排挤出去，使布尔什維克在苏維埃中占多数，改变苏維埃的政策。这是預計到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針，这个方針是在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見的情况下制定的。列宁說，那时候，“苏維埃是由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压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群众的代表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沒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問題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就是在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最近要走的一步、直接能够实现的一步的口号。”①

列宁很早就說过，工人階級但願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是無論从理論上或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无产階級放棄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輕举妄动，就只能是对資產階級和一切有产階級的可耻让步。資產階級不会对无产階級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們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②。因此，列宁在預計革命和平发展的时候，並沒有放棄用革命精神教育和組織群众，並沒有放棄暴力革命的实际准备。

果然，有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資產階級临时政府，沒有对无产階級实行和平的让步，在七月四日用暴力鎮压了举行和平示威的群众，并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結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被鎮压了的七月三——四日的群众示威，尽管布尔什維克事先曾經阻止过，但是列宁絕不像机会主义者那样非难革命的群众。他写道：“如果我們党不支持七月三——四日这次不顾我們的阻止而自发地掀起来的群众运动，那就是直接地完全地背叛无产階級，因为群众已經行动起来，……他們的憤慨是合理的，是正当的。”列宁还說：“我們党在七月三——四日这两天所犯的真正錯誤，就在于党对全体人民的革命情緒估計不足，党认为政治改革还可以通过改变苏維埃的政策而和平发展，但事实上，当时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經由于同資產階級妥協而把自己弄得昏头昏脑，資產階級已經完全是反革命的了，因而，談不上什么和平发展。”③

① 《論口号》。《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3—174頁。

②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頁。

③ 《关于目前政治形勢的決議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7頁。



七月事件表明，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沒有了。列宁写道：使革命和平发展，“这对人民来说会是最容易、最有利的事情。这会是一条最无痛苦的道路，所以当时应当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但是现在，这个争取政权及时轉归苏維埃的斗争已經結束。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經不可能了。”^①在列宁的指导下，布尔什維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

九月間，有几天又出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当时，布尔什維克领导的群众武装击潰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苏維埃开始轉到布尔什維克方面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生了危机。列宁在《論妥协》一文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組成完全而且仅仅对苏維埃負責的政府，只要布尔什維克真正有鼓动的完全自由，只要立即以新的民主精神改选苏維埃，布尔什維克就将通过苏維埃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使革命和平发展。但是，这种可能轉瞬間就消逝了。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幕后協議，帮助了地主和资本家稳定自己的統治。列宁在写了《論妥协》一文后的第三天，又在該文末尾特別注明：“和平发展的道路偶然成为可能的那几天已經过去了”，这篇文章已經成为“过时的思想”了。^②

列宁說：“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銀行資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壟断时代，壟断资本主义轉变为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③在这样的时代，无产阶级用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更加成为必要的了。

誰在决战时刻拒絕武装起义，誰就是可耻的叛徒

列宁指出，在进行最后决战以前，工人阶级的政党，决不放棄一切可能的合法活动，包括議會斗争，但是，“应当把百分之一的精力用在这个清談館上，而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在群众上。”^④“一小时也不要放棄合法活动。但是也不要相信立宪的和‘和平的’幻想。”^⑤誰要是在决战的时刻拒絕武装起义，誰“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叛徒”^⑥。

当武装起义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俄国的政治现实的时候，机会主义者恶毒地誣蔑列宁和布尔什維克是“布朗基主义”。列宁粉碎了这种誹謗，指出：“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阴

① 《論口号》。《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4—17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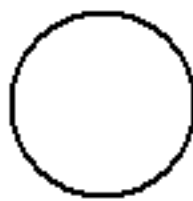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5頁。

③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7頁。

④ 《論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維克的錯誤》。《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頁。

⑤ 《政治形势》。《列宁全集》第25卷，第168頁。

⑥ 《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第26卷，第64頁。



謀，不应当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上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①

关于起义的时机，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一文中写道：“九月底是俄国革命史上的，而且大概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的最伟大的转折点。”必须制止“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②由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阻挠，起义一再拖延。列宁为了争取及早实现武装起义，同他们进行了艰巨的斗争。从九月底（俄历）到起义前夕，列宁一直不断号召立即起义，并且反复警告说，拖延起义“就是犯罪”，“就等于自取灭亡”，“就等于断送革命”。由于列宁坚持不懈的斗争，武装起义终于在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取得了胜利。

经过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斗争，扫荡了弥漫在革命道路上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乌烟瘴气，列宁主义的万丈光芒终于照亮了俄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道路。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光明大道。

十四 经过斗争，争取实现和平与和平共处

取得暂息时间，巩固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紧张而艰巨的斗争。对内，需要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制，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对外，需要立即结束战争，实现和平。

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十一月八日，在列宁主持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令》，规定立即无偿地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交给劳动者使用。在这个会上还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这个法令指出，苏维埃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毫无例外地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

①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57、65页。



爭。”^①这个法令，向各国无产阶级特别向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列宁在说明这个法令时指出，要帮助各国人民干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坚信“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②。

《和平法令》公布以后，列宁指出：“现在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展开了。这个斗争是困难的。谁以为和平可以轻易获得，谁以为只要一提和平，资产阶级就会用盘子把和平给我们端过来，谁就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谁把这种观点妄加在布尔什维克身上，谁就是在骗人。资本家拼命厮杀，是为了分赃。很明显，粉碎战争，就是战胜资本，而苏维埃政权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开始进行斗争的。”^③“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把刺刀往地上一插，一下子就可以结束战争。”^④

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遭到了英法美等国的拒绝，于是，它便单独同德国及其同盟国进行谈判。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谈判在布列斯特开始。德国政府在谈判中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割地、赔款。当时，俄国的旧军队已经瓦解，不能继续作战，而建立一支真正可靠和思想巩固的社会主义工农军队的工作还刚刚开始。粮食空前缺乏。人民已经精疲力竭，困苦不堪，渴望结束战争。其他国家还没有爆发革命。列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进行战争，那就便于帝国主义来摧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因而主张立即签订和约。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必须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必须在当时最危险的强盗德帝国主义面前实行退却，以便取得喘息时机，建立新的军队，即建立能够保卫苏维埃祖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红军。但是，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却反对列宁的方针，他们主张继续战争或所谓“不战不和”。当德国提出最后通牒时，担任苏维埃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又声明说：我们在复员军队，我们不进行战争。这样，德国军队就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开始全线进攻，占领了苏维埃国家的许多领土，并威胁彼得格勒。列宁发出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警号，号召人民起来保卫苏维埃祖国，加紧建立人民武装，抵抗德国军队的进攻。年轻的革命军队英勇地抗拒了全副武装的德国强盗的攻击。同时，列宁跟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斗争，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德国政府，同意按在布列斯特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德国政府则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要求割让更多领土。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的条件，于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签订了和约。

列宁批判了“左派”的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空谈，阐明了缔结和约对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现实意义。

列宁指出，布哈林、拉狄克等“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这种空谈很漂亮、很诱人，但是毫无

①②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228、229、231页。

③ 《在全俄海軍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3页。

④ 《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綫代表联席會議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4页。



根据。帝国主义武装反对苏维埃政权在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当时阶级力量和物质因素的对比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战争，就是拿苏维埃政权的命运作孤注一掷的冒险。英法帝国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正是希望苏维埃俄国继续进行战争，来搞垮苏维埃政权。如果继续进行战争，那就上了帝国主义的圈套，就会断送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①

苏维埃政权缔结和约，“不是为了向帝国主义‘投降’，而是为了学习和准备同它进行严肃认真的战斗。”^② 列宁反复指出：我们绝对必须准备革命战争；必须建立严整的、全民的和强大的军队；要善于坚持不懈地养精蓄锐，准备东山再起；“要从事组织，组织和组织。不管有怎样的考验，未来一定是我们的。”^③

事实正是这样。在和约缔结以后，苏维埃国家就获得了喘息时机，赢得了组织红军的时间，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秩序，为后来击败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准备了条件。

布尔什维克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一种妥协，这是有利于革命的妥协，只是“交出了次要的利益而保存了根本的利益”^④，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不給机会主义者留下恶意歪曲的余地，列宁用许多比喻来说明两种妥协的原则区别。他说：“工人在罢工失败以后，同意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资本家的复工条件，这并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那些为了追求部分工人的利益而使资本家有利的人，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才是不能允许的。”^⑤ 他又说，应当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在遭到武装强盗拦截时，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列宁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一贯坚持革命路线的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并指出：“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者破坏了和议而布尔什维克已经做了人力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加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以后，它才被迫屈服于布列斯特强盗的暴力之下。”“这样的政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⑥ 列宁同时也揭露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贯实行叛卖和变节的可耻历史，指出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妥协，自始至终是在于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犯。”^⑦ 列宁教导说：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别有利于革命的妥协和叛

①⑤ 《談論不幸的和約問題的历史》。《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1、417頁。

② 《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訓》。《列宁全集》第27卷，第50頁。

③ 《不幸的和約》。《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頁。

④ 《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1頁。

⑥⑦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頁。



卖性的妥协，懂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妥协，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妥协。

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拿布列斯特和约来为他们的叛卖性妥协的行为作辩护。他们说：“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他们企图把列宁描述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张妥协的。这种做法，是十分卑鄙的，也是徒劳的。

实现和平共处，我们这方面没有障碍

苏维埃政权由于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所获得的暂息时机，是极其短促的。从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开始，外国武装干涉者就联合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势力，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经过两年多的英勇战斗，到一九二〇年末，终于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的主要势力。这样，苏维埃国家就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时期。实践证明，布尔什维克不但善于通过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来争得暂息时机，而且敢于拿起武器，用革命战争来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复杂的、曲折的斗争中，列宁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问题。

列宁多次宣告，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同各国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苏维埃政府曾多次提出媾和的建议，申明自己始终不渝地执行争取和平的政策，但是外国武装干涉者一直阻碍着和平的实现。列宁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道：“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实现和平共处，“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①

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列宁在答英美记者问的时候，表示愿意同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一九二二年四月，英法等国发起在热那亚召开国际经济会议，苏维埃政府也派了代表团参加。列宁指出：“我们到热那亚去的实际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②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报告的决议草案》中说：代表团正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维护了苏维埃俄国主权的完整，同在俄国恢复奴役和私有制的企图进行了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是可能的，但是必须经过斗争。列宁说：“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③事情正是这样。在遭到了苏维埃人民的痛击以后，外国武装干涉者不得不暂时停止武装干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们也就一个一个地同苏维埃国家建立了贸易和外交关系。出现这种情况，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和殖民地附属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列宁说：“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反对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活动已大大增长，这就助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

① 《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3、333—334页。

②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第231页。

③ 《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3—124页。



运动，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广大群众也转到运动中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原已很尖锐，现在更日益加深。东方千百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于这一切情况，纵使国际帝国主义比苏维埃俄国要强大得多，但无力扼杀它，反而不得不暂时承认它或半承认它，不得不和它订立通商条约。”“这样就形成了这种虽然极不坚固、极不稳定，但总还是一种均势的状态，即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①

赢得世界持久和平的唯一道路

列宁在争取实现和平共处的同时，从来不对帝国主义抱幻想。他一再告诫说，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不能容忍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共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时刻警惕帝国主义挑起冲突，破坏和平。在外国武装干涉开始以前，列宁就指出：“国际帝国主义拥有极雄厚的资本，拥有组织得极其完备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共所以不能，在于贸易关系，在于国际财政关系。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② 在外国武装干涉发生以后，列宁又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③

正因为这样，列宁反复强调，“我们在采取各种促进和平的步骤的同时，也应当极力从事军事准备，绝对不能解除我们军队的武装。”④ 要“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我国和我们红军的防御能力”⑤。列宁教导说，不要轻信资产阶级的“和平”诺言。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某种协议，也会在它们认为需要的时候加以撕毁，“在激烈的国际冲突面前，条约和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⑥ “我们政策中的第一个训条，从我们政府一年来的活动中所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所有工人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各种侵袭的危险。我们要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灾难发生。”⑦

要赢得世界永久和平，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列宁说：“除了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谈判、任何对于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⑧ 唯一的道路是“用革命的办法摆脱资本主义桎梏，消

①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41—442页。

②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79—80页。

③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129页。

④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0卷，第414页。

⑤⑦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4、121页。

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342页。

⑧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3页。



灭资产阶级统治，赢得社会主义社会和持久和平”^①。

要消灭资本主义，绝不能像胆小如鼠的机会主义者那样，害怕和屈服于资本主义的暴力，而要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列宁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著作中，就作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确信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战胜的。列宁把帝国主义比喻为“泥足巨人”、“稻草人”、“衰老垂死、病入膏肓的老头子”。他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演说中说，两年以前，“当时人们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种力量，简直是发了狂。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的情形就可以看到，连我们的敌人也愈来愈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看到：像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巨人”。“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们已在腐烂，它们使我们愈战愈强，使我们能够击退外来的侵略，取得彻底的胜利。”^②

十五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划分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首要标志

伟大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在许多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问题。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成为划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首要标志。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纷纷攻击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饱有学识”的并且精通诡辩术的考茨基写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竭力歪曲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把它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庸俗的自由主义学说。他在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的时候，拼命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他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从“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中通过“和平”的、“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出来的，并且责备布尔什维克采用了暴力手段，责备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毫无理由”地“损害民主”、“消灭民主”。考茨基的这套谬论的实质，就是用资产阶级民主即资产阶级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论“民主”和专政》、《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论国家》、《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等著作中，全

① 《为了面包与和平》，《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面而严密地驳斥了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的其他机会主义者在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谬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些叛徒的可鄙的、丑恶的面貌。这些著作，是列宁继《国家与革命》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贡献了极珍贵的理论财富。

考茨基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

考茨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偶尔用过的一个“词儿”。列宁痛斥了考茨基的这种荒谬绝伦的歪曲。他引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列宁指出，这是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著名论断。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所在。

列宁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机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考茨基掩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可鄙地吹嘘“纯粹民主”和“一般民主”。他把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认为英美有可能和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搬到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大谈其“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的过渡。他并且捏造说，巴黎公社是由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考茨基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老爷们“教导”人们说：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普选权争取多数，然后根据这种多数投票表决取得国家政权，最后在“彻底”或“纯粹”民主制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

列宁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他说：“纯粹民主”是永远也不会有的，只要阶级存在，就只能是有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②尽管资产阶级的宪法有许多“自由”“平等”一类的华丽词藻，它归根结蒂是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列宁说：“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③“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有許多漏洞或限制，以保证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5页。

③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315页。



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状态和试图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军事戒严等等。”^①至于“资产阶级的议会，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最民主的议会，只要国内还存在着资本家的所有制和资本家的政权，就总是一小撮剥削者镇压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机器。”^②

考茨基伪造巴黎公社历史的做法是十分笨拙可笑的。列宁指出，当时资产阶级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赛，集中全力来反对公社的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的斗争就是法国工人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难道能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全民投票”和“纯粹民主”吗？考茨基援引马克思关于英美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来为自己辩护，这是徒劳的。列宁说，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美两国还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马克思当时是把它当作革命历史规律的例外情形来设想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主张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典型到什么程度或可能到什么程度时，竟‘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下流的奴僕了。”^③

无产阶级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把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但是，如果像考茨基们所主张的那样，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或者受制于设法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获得大多数选票，那就是极端愚蠢或者欺骗工人。列宁说：“当我们的斗争还只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以内进行时，社会主义者，为劳动者摆脱剥削而斗争的战士，就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把它当作讲坛，当作一个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基地。现在，世界历史已把摧毁这个制度、推翻并镇压剥削者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如果再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民主，把这种民主粉饰为一般‘民主’，掩盖它的资产阶级本质，忘记了只要资本家所有制还存在，普遍选举权就始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武器，那就是卑鄙地背叛了无产阶级，投奔到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方面去，成为变节分子和叛徒。”^④无产阶级为了把大多数人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粉碎旧的国家机关，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⑤

同资产阶级民主相反，无产阶级民主只给劳动者以真正的民主，决不给剥削者以民主。

①③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6、221页。

②④ 《给欧美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9—410、410页。

⑤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4页。



苏维埃俄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自由和民主给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全体劳动者，同时，对剥削者实行专政，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反抗。对于这种情况，考茨基很不喜欢。他做出书呆子或天真孩童的样子问道：既然剥削者占人口的极少数，劳动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为什么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

列宁回答说：剥削者占人口的极少数，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而不是抛掉国家的阶级性和民主的阶级性，来抽象地谈什么多数少数。无产阶级所以要专政，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使反动派畏惧”，“维持武装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能够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要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阶级。“若以为在比较深刻的、严重的革命中，可以简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愚蠢到了极点，就是固守庸俗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反抗，多年内在事实上对被剥削者保有巨大的优势。剥削者在没有在最后的、拚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像甜蜜蜜的傻子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议。”①

列宁指出，考茨基这样那样地歪曲马克思的学说、进行诡辩，不过是要使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史无前例地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可鄙地吹嘘‘纯粹民主’，掩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暴力。既然考茨基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的‘解释’，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②

不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就有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

俄国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这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必须把阶级斗争继续进行到底。列宁说，“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阶级斗争，而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方法把斗争继续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③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同剥削阶级进行的斗争，采取了最尖锐的国内战争的形式。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在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进行武装叛乱。富农还窝藏

①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223—224页。

③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8页。



粮食，企图用饥饿困死苏维埃政权。城乡投机活动十分猖獗。在苏维埃各个部门工作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怠工，从内部进行破坏。同时，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逐步改造小农和巩固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的纪律的严重任务。

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事实上保有很大优势：他们有金钱，有动产，有组织和管理技能，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同那些过资产阶级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高等技术人员有密切关系，有军事技能等等；一部分小生产者会跟着他们走；他们还有非常广泛的国际联系。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他们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①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②。

列宁警告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不仅在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武装叛乱，而且他们还力图使苏维埃政权“和平演变”、蜕化变质。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敌人“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③。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指出，敌人把苏维埃国家实行新经济政策诽谤为“内部的蜕变”。列宁说，“这的确是阶级敌人粗暴地公开说出的阶级真话”。他要大家警惕，敌人“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④。他还曾多次指出，在经济上剥夺了剥削阶级以后，仍有可能产生新的剥削者。他说：“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历史上，在清除了老的一代的土壤上，经常出现新的一代又一代，只要土壤能够生产，它就会生产出够多的资产者。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⑤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所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建立起能够管理产品的一切生产和分配的、巩固的和严整的组织；同混乱、捣乱、破坏等现象作无情的斗争。要实现这些任务，必须依靠专政。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是专政的一个主要方向。另一个主要方向，是镇压各种坏分子。列宁说：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非常之多，这些人在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236页。

②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1页。

③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0卷，第422页。

④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3页。

⑤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不“露头角”，“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①

列宁指出，从前历次革命的不幸，就在于群众镇压剥削者和坏分子的革命热忱未能长久支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未能把大多数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吸引过来，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② 列宁强调指出，专政不应当像浆糊，而应当像铁一般坚硬，“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③。

改造小商品生产者，这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另一个严重任务。列宁指出：广大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是小私有者。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小生产者“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他们用这种“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消灭阶级不仅仅是剥夺地主和资本家，“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④ 只要这样做，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从苏维埃政权内部来进攻无产阶级，钻空子来收买、利用一切蜕化分子，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很多动摇的、软弱的人无力抵抗投机、贿赂和个人利益的诱惑，不惜牺牲集体利益来换取个人利益。这样就妨碍苏维埃政权战胜经济上的困难。列宁认为必须惩办严重破坏无产阶级队伍纪律的人。他愤怒地驳斥了那种认为实行劳动纪律就是倒退的荒唐论调，号召劳动群众加强组织性，自觉遵守劳动纪律。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只是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制度、劳动纪律、劳动生产率、统计和监督、空前巩固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的保证。”^⑤ 应当用共产主义精神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帮助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以及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这方面的工作是会碰到很大困难的，有时还会遭到失败，但最后总是会胜利的。

无产阶级专政既要镇压剥削者和坏分子，又要改造、教育小商品生产者和巩固无产阶级

①②③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2、243页。

④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页。

⑤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374页。



内部的劳动纪律，既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又要战胜资本家在思想方面的最广泛、最强烈的反抗，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列宁写道：“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①

列宁指出，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相当的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发表以后不久，列宁在为《国家与革命》增写的一节里又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

十六 在革命浪潮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第三国际

无产阶级英勇坚决的革命斗争和机会主义者卑鄙无耻的叛卖活动

国际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一千万人的生命，使几千万人变成了残废，毁灭了几千亿美元的财富。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饥寒交迫，对统治阶级的愤恨已经不可遏止，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十月革命为他们树立了行动的榜样。在欧洲许多国家里，都出现了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

一九一八年一月，维也纳爆发了总罢工。接着，柏林五十万工人也举行了总罢工，德国的许多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九一八年十月，捷克、匈牙利相继宣告独立，奥匈帝国土崩瓦解了。十一月，波兰也宣告独立。德国的工人和士兵，从十月底起，纷纷起义，成立苏维埃，在许多地区掌握了政权。十一月九日，柏林工人和士兵举行起义，德皇被迫退位。李卜克内西从皇宫的阳台上向武装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示威队伍发表演说，宣告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一九一九年三月，以贝拉·库恩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页。

②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全集》第30卷，第8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9、400页。



党共同組織政府，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法、意等国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罢工。列宁說：“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①

列宁热情地歌颂和支持德国、匈牙利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并且及时地向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忠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在《给欧美工人的信》中指出，“德国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和唯一的代表‘斯巴达克派’反对卑鄙的叛徒謝德曼、休特古姆同资产阶级勾結的斗争，清楚地表明，历史是怎样对德国提出問題的：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打着各种招牌（像‘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之类）的资产阶级议会。”^②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列宁就提醒匈牙利共产党人，要他们注意社会民主党人是不是真正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一九年五月，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系统地介绍了俄国无产阶级巩固自己的专政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应当继续坚持阶级斗争，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他强调說，如果昨天加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有人表现动摇，就要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

在蓬勃发展的革命浪潮中，各国的革命左派领导群众斗争是英勇的、坚决的，但是，他们经验不足，力量还薄弱，对列宁的忠告没有很好地领会和贯彻执行，没有彻底揭露机会主义者并且及时同他们决裂，这就便利了机会主义者的叛卖活动。一贯不愿革命、害怕革命、敌视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这时公开地站到反革命资产阶级方面，成为“资产阶级的工人尉官”。他们和资产阶级一道，帮助资产阶级绞杀了群众的革命运动，在危急关头拯救了资产阶级。

在德国，当一九一八年一月柏林工人大罢工的时候，机会主义者篡夺了罢工的领导权，帮助德国政府，镇压了罢工运动。謝德曼曾经恬不知耻地、洋洋自得地说：“一月革命所以没有酿成灾祸，绝不能感谢当时的‘统治者’”，“我们预防了俄国的秩序”。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的首領艾伯特、謝德曼、盖茨等人组成了临时政府。自称“我痛恨革命正如我痛恨罪恶一样”的艾伯特宣布，他将根据帝制国家的宪法来管理德国。謝德曼则声明要向共和制度过渡，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十二月十六日，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开幕，右派和“中派”在大会上占了多数。大会召开的时候，柏林二十五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推翻艾伯特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宣布德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大会拒绝了群众的要求，决定把全部政权交给艾伯特政府，赞成召开立宪会议。一九一九年一月，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諾斯克下令镇压了柏林工人的武装起义。一月十五日，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領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艾伯特和諾斯克下令杀害了。机会主义者当了屠杀无产阶级領袖的劊子手、杀人犯。在血腥镇压了工人群众的革命发动之后，召开了立宪会议，通过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宪法。德国革命失败了。

在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領袖，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曾经被迫接受共产党提出的

① 《在馬克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7—148頁。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9頁。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但是，在协约国帝国主义武装进攻匈牙利之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就力图取消苏维埃政权，并且积极参加了反革命暴乱。在内外敌人的夹攻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于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复灭了。

列宁无比愤怒地谴责了机会主义者叛卖革命的罪恶行为。他指出：机会主义者的叛卖，是德国、匈牙利革命所以失败、资产阶级统治所以能够继续维持或者复辟的一个根本原因。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被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出卖了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复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党人的叛变。列宁要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记住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沉痛教训：“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①

新型的、革命的国际和腐朽的、黄色的国际

还在德国、匈牙利革命前夕，列宁就指出：“欧洲的最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当然，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能够纠正这个缺点，但它现在还是一个大不幸和大危险。”^②列宁的预见全部证实了。欧洲各国革命被无产阶级叛徒所葬送，这个大不幸教育了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浪潮的基础上，许多国家里相继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到一九一九年初，就有了三十九个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者的组织。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列宁就为团结各国的革命左派、建立第三国际、恢复和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列宁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三十个国家的代表。列宁亲自领导了这次大会，在会上就主要议题——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了报告。在报告中，列宁指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列宁论证了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根本规律：“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所绝对必需的”^③。列宁的思想为大会所接受，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号召各国无产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新型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第三国际的建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列宁在《第

①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2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96页。

③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6、435、440页。



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写道：“第一国际（一八六四——一八七二年）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第二国际（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组织，这个运动当时是向横的方面发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的破产。”“第三国际承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百年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一面是革命者的联合，一面是叛卖者的纠集。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社会和平主义者麇聚在伯尔尼举行他们的代表会议，企图恢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业已破灭的第二国际。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原第二国际的二十六个党派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决议，通过了承认和支持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的决议。会议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斥资布尔什维克党，只是由于害怕工人群众，才不敢做出正式的决议。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写道：“保护强盗式的‘国际联盟’；为同本国资产阶级订立直接间接的联盟辩护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运动；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辩护而反对‘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不可容忍的叛卖性妥协的最主要表现，这些妥协合在一起就成为危害革命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机会主义。”^② 参加伯尔尼国际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列宁说：伯尔尼国际是“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③。

只有同机会主义派别决裂，才能加入第三国际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同第二国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各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纷纷离开了第二国际，站到第三国际方面来。成立还不到一年的第三国际，在投机政客们的眼里，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和诱人的东西。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间，第二国际最有势力的政党，如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美国社会党，尽管在实际上仍然坚持第二国际的立场，反对第三国际的原则，却虚伪地声明退出第二国际，要求加入第三国际。列宁说，这个事实说明，纠集了无产阶级叛徒的、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已经被击溃；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列宁同时强调指出，机会主义“是一种缠人的病症，要治好它，比乐观主义者所想像的要费时得多。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27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第51页。

③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7、459页。



級的社会主义，而是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資產階級，比資產者亲自出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們来领导，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无法維持了。”^①列宁指出，第二国际的一些旧的政党和領袖所以要求加入第三国际，正是为了繼續在工人运动内部充当資產階級的代理人 and 帮凶，这“对無產階級解放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大的直接危險”^②。

为了克服这个主要危險，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列宁起草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著名文件。文件规定，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須很好地向群众說明無產階級专政的必要性，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全部实际活动中承认無產階級专政；必須无情地斥責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和平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同它們彻底决裂；必須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結合起来，坚持不懈地在军队、工人群众和农民中进行宣傳鼓动工作；必須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須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維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必須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党，党内应有铁的紀律。这个文件，为一九二〇年七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

列宁制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社会党内引起了广泛的討論。圍繞着这个討論，这些党内的左派同“中派”、右派之間展开了尖銳的斗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接受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和德国共产党合并。一九二〇年底和一九二一年初，法国、瑞士、意大利社会党的左派也相继和“中派”、右派决裂，組成了共产党。

“中派”分子不贊成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九二一年二月，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中派”在維也納召开了代表會議，成立了維也納国际。这个“国际”口头上批評第二国际，实际上遵循着和第二国际一样的机会主义路綫，因而被称为第二半国际。一九二三年五月，第二半国际就并入了伯尔尼第二国际。

第三国际的誕生以及它同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胜利。列宁締造了第三国际，捍卫了第三国际的純洁，保障了各国共产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国际团结。在列宁的领导下，第三国际高举革命的紅旗，团结了各国無產階級中的一切优秀分子，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

十七 批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工人运动内部的两种錯誤思潮

为了把各国無產階級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要求各国共产党像布尔什維克那样，既要有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頁。

^②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綱》。《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1頁。



原則的坚定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既不陷入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泥坑，又不犯“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适应这种需要，列宁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写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总结了俄国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的经验，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工人运动的内部敌人进行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并得到锻炼的。他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现在它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无论过去和现在布尔什维主义都对这个敌人给予最大的注意。”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敌人，是“左”倾思潮，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①。列宁认为，“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首先而且主要是正在成长、巩固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反对本国的（每个国家的）‘孟什维主义’，即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反对共产主义‘左派’的斗争（这可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②

对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存在的“左”倾错误，列宁是这样估计的：“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与右倾教条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与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不过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③这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抱有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这是一种异常可喜、可贵的情绪，应当善于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获胜的希望。对于那些善于表达群众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这种（往往是蒙昧的、不自觉的、未唤醒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竭力帮助。”列宁又接着说：“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某些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④

无论是右倾思潮或者是“左”倾思潮，在本质上都是非无产阶级的，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彼此补充、互相转化。列宁一再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继续以主要力量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要反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已经产生的“左”倾错误。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部著作中，列宁痛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叛卖行为，详尽地批判了“左”倾思潮，总结了俄国三次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初期的经验，总结了德国和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反复教导共产党人学会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和斗争艺术，竭尽全力来引导千百万群众前进，以争取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利。

^{①②③④}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14、72、84、61页。



普遍规律和民族特点相结合

列宁叙述了俄国的革命者寻找真理的痛苦过程和布尔什维克经历的多种斗争形式。他说：“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以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①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又经历了十五年（一九〇三至一九一七年）的斗争实践。在“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激烈的，秘密的与公开的，小组的与群众的，议会方式的与恐怖主义的”复杂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熟练地掌握了能进能退、善攻善守的革命策略，从而获得了无比丰富的经验。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②。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的意义，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可是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国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却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就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糟糕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辩护人。”^③

毫无疑问，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十月革命所反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的时候，必须结合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特点，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列宁说：“要使各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这个基本的原则性的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别种种特征而具有而且必然具有的一些具体特点。”^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策略上的统一，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取消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到各民族、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时，在细节上把这些原则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应用于这种情况。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性，这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⑤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和党的纪律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论述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党的纪律问题，批判了“左派”共产党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糊涂观点。

①②③④⑤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8、8、12、1、2、73、73—74页。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之间对立的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机会主义领袖叛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起了普通党员和劳动群众对这些“领袖”的愤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左派”共产党人，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懂得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什么“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的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进行革命活动，没有领袖是不可设想的，问题在于选择什么样的领袖。列宁说：“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地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旧领袖。”“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把群众和阶级拿来对比，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比才可以”。“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不然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

“左派”共产党人在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相互关系上的糊涂观点，实际上就是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列宁说，这就等于为资产阶级效劳而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这就等于放纵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统一行动等劣根性，而纵容这些劣根性，就必然使无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都遭到失败。

列宁总结了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经验，认为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进行需要有坚定性、需要有纪律、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②这种纪律依靠什么来维持呢？依靠什么来检验和加强呢？“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說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它的政治战略与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列宁特别强调指出：“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领导先进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这个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这些条件而企图建立纪律，这种企图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③

^{①②③}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24、23、28、23、5、6—7页。



必須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

列宁分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认为提到各国共产党的日程上来的任务，是要布置百万大军，配置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促使决战时机完全成熟。这就要求：（一）使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完全陷于混乱，彼此冲突，互相厮杀，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而筋疲力尽；（二）使一切动摇的、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妥协分子，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三）使无产阶级中间主张采取最坚决、最勇敢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那种群众情绪产生出来，并且大大高涨起来。到那时候，革命时机就成熟了。如果共产党人能够正确地选定时机，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要做到这些，共产党人必须把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才干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加速他们的分裂和崩溃；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最充分地发动群众，并且时刻准备着最迅速和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列宁说：“一支军队不想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极大的失败，有时甚至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①

列宁教导各国共产党人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关中，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用革命的方法来行动的群众中，捍卫革命的利益，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坚决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

“左派”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在反动的工会里工作，应该退出工会，另外创立一种崭新的、清一色的共产党人的“工人联合会”。列宁说，这是“可笑的幼稚的废话”，最清楚地说明了“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浮。列宁指出，拒绝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是把那些不十分开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委弃在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走狗、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影响之下。要想帮助群众，博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正是要在有无产阶级群众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里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哪怕那些机构是最反动的，也要不顾一切牺牲，克服重大障碍以便系统地、不屈不挠地、坚韧不拔地、耐心地在那里进行工作。”^②

当然，在反动的工会里工作的共产党人，必须同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列宁说：机会主

①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7、34—35页。



义者、工人贵族盘踞西欧各国的工会，他们具有帝国主义的情绪，被帝国主义收买。必须同他们斗争到底，使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领袖们颜面扫地，并且把他们从工会中驱逐出去。不把这种斗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

“左派”说，“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斗争形式，都应当坚决拒绝。”^① 列宁回答说：“不能把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阶级也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政党、作为群众的政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教育不开通的、闭塞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② “最尖锐、最无情和最坚决的批评，不应当是对准议会制度或议会活动，而应当是对准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利用议会讲坛的领袖。”^③ 拒绝参加议会是幼稚的，因为用这种简单、轻便、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是不能解决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的，这样做，实际上是逃避困难。

列宁教导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异乎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方式，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欺凌的贫民的帮助下散发传单，走遍工人住所，走遍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深入最普通的平民酒馆，进入最普通的平民会社、团体以及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像在议会中说话那样）跟民众说话，丝毫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要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关和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向群众宣传布尔什维主义”^④。

革命者的妥协和叛徒的妥协

“左派”还提出了“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他们说，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的政策，都是不正确的和异常危险的，都应当坚决拒绝。列宁批判了这种所谓“原则上”反对妥协的有害的说法，认为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在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有不少实行妥协的事例：还在布尔什维克产生以前，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間，列宁参加的老《火星报》编辑部，就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司徒卢威成立过政治联盟；一九〇七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过短期的政治同盟；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二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尔什维

① 转引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37页。

②③④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47、80页。



克同考茨基派等，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十月革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全盘接受了未作任何修改的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所有这些都是妥协。布尔什维克通过这种妥协，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联合他们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从来没有受这些政治派别的约束，一直对它们的错误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斗争。列宁指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革命活动中，特别是在推翻国际资本的斗争中，就像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一样，绝对不可能走一条笔直又笔直的大道，一定要通过许多迂回、曲折和中间站，才能达到最终目的，也就是一定要采取许多机动、通融和妥协的策略。应当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应当运用这个策略，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的敌人。

“左派”反对布尔什维克实行革命的妥协，而机会主义者则歪曲地援引布尔什维克所作的妥协，来为自己的叛卖行为辩护。为了教育革命者，同时也是为了回击机会主义者，列宁反复地论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他说，“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罢工者钱用完了，没有外方援助，陷于极端的饥饿和苦难）所迫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使接受这种妥协的工人削弱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把一切推在客观原因上，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有时是被资本家说服，有时是被他们的小恩小惠引诱，有时是被他们的甜言蜜语迷惑住了”^①。前一种妥协，是局部的、非根本问题上的、暂时的妥协，是为了等待有利的条件，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对敌人进行英勇无畏的进攻；后一种妥协是放弃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叛卖性的妥协。列宁又举布尔什维克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例子，说明这是革命的妥协，是做得完全正确的，不容机会主义者任意歪曲；而机会主义者同资本帝国主义强盗实行妥协，则是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强盗的同谋犯，是叛卖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妥协。妄图把这种妥协同革命的妥协混为一谈，是拙劣的、可卑的。列宁说：“愿意作一个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在何种具体情况下，妥协是机会主义和叛卖的表现，因而是不能容许的，并且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评，最无情地加以揭露，毫不调和地同它作战，决不许那班老于世故的‘求实主义’的社会党人以及议会掮客，拿‘一般妥协’的空谈来支吾搪塞，脱身卸责。”^②

既要具有革命热情，又要保持冷静头脑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它在国际范围内影响的不断扩大，使俄国和国际资产阶级几

^{①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49、19页。



乎气得神经错乱。他们一方面用暴力镇压革命，一方面发动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围攻。他们建立了各种经费非常充裕的机构，增雇了很多学者、鼓动家、神甫之流，发行了无数书刊和报纸，用各种腔调痛骂布尔什维克。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们总以为用真枪真剑或唇枪舌剑可以窒息真理，但是，事情却和他们的愿望相反，正是由于他们的围攻，促使了更多的群众去探索真理。对于他们所干的蠢事，列宁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应该对这些资本家先生鞠躬致谢。他们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帮助我们使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和意义问题发生兴趣。他们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因为要‘抹杀’和窒息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办不到了。”^①

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左派”却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他们单凭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他们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列宁在分析这种思潮的社会根源的时候指出，小资产者“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狂热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有一种很快就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的特性”^②。

列宁认为，“左派”的情绪，在某些方面表达了被压迫被剥削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憎恨，这是可贵的。但是，制定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热情，而必须清醒地极为客观地考虑本国的和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参照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他说：“政治乃是一种科学，乃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③。

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列宁说：“要想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④

在政治上教育千百万群众，只有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列宁说：在领导群众对敌人进行决战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布置就绪了”^⑤。“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至少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且表示完全不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

①②③④⑤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82、14、61—62、52、75页。



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①。

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既要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坚强信心和无比热情，又要在实际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冷静的头脑，并且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列宁说：“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豕突狼奔，暴怒若狂，肆意横行，做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向布尔什维克预先报复，竭力屠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个、几千个以至几十万个明天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的垂死挣扎一样。”^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着；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摧残和迫害削弱不了它，困顿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各国共产主义者应当坚信，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我们的。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应当把最大的热情和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把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高度原则性和策略上的最大灵活性结合起来，更有信心地、更坚定地向前胜利前进。

十八 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形势和任务

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工程提到日程上来。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我们已经夺取了俄国——从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穷人，从剥削者手中夺过来交给劳动者。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我们必须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崇高的）任务的人。应该考虑到，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人民，除了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并且这也是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因为只有在解决这个任务以后（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决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③

但是，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经济建设工作被迫中断。一直到一九二一年，党才重新把工作转移到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

当时经济情况非常困难。经过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的国内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和燃料极端缺乏。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已经处于同农民利益相抵触的地位，工人当中也有了不满情绪。显然，必须针对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方针。

①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4、82—8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1、221—222页。



列宁指出，当时的任务是要在恢复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工业，给工农联盟建立新的经济基础。要恢复农业就必须用粮食税代替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就必须扩展全国商品流转，允许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这样，农民的经营兴趣就会提高，农业就可以迅速恢复。在农业生产恢复的基础上，工业就可以恢复并发展起来，反过来又会给改造个体农民提供物质条件。

列宁早在一九一八年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就分析了过渡时期俄国的经济结构，指出俄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宗法式的自然经济，个体农民的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后来列宁又把它们分成三种基本的经济成分，即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就是代表这三种经济的社会力量。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着“谁战胜谁”的斗争，无产阶级只有在战胜了资本主义，把全部小商品生产纳入社会主义大经济的轨道，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以实行粮食税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保证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策。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倡议，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全面地论证了这个政策。正如斯大林所表述的，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①

在党的政策这个重大转变的时节，不少人思想上是混乱的，政治上是动摇的，而托洛茨基则利用这种时机向党发动了进攻，他恶毒地挑起了一场大争论。接着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集团都起来反对列宁。

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争论

这场争论是从职工会问题开始的，其实，职工会本身在当时并不是党的政策中的主要问题，事实上争论也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一九二五年一月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决议指出，当时所争论的实际上是“关于应如何对待那些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农民，关于应如何对待非党工人群众，以及一般关于党在国内战争已归于结束的那个时期中对待群众的方法问题”^②。

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吸引广大的工人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党和苏维埃政府周围，积极地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采用说服方法，党和职工会毫无疑问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托洛茨基却提出了“整刷”工会的口号，他把工会看作国家机关，要在工会当中采取强制的军事

①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2—303页。

② 转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34页。



命令手段。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要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列宁说：“假如党与工会发生分裂，党是有罪过的，其结果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因为除了千百万无产者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支柱”^①。

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时，论证了工会的性质和作用，论证了工会和国家以及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列宁说：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②它是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的桥梁。“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整个这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把阶级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③

布哈林在这场争论中纠集起一个所谓“缓冲”集团，其实他完全是帮助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列宁说：布哈林所做的，正是往火上倒煤油，但名之曰“缓冲煤油”。

托洛茨基在争论中攻击列宁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自己则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是“关心生产”的。布哈林站在折衷主义立场，说什么“从经济上”看问题和“从政治上”看问题有同等价值，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偏重了一个方面。列宁批驳了这些错误观点，他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这个著作中，深刻地论证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列宁写道：“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④

对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批判

跟在托洛茨基后面反对列宁的“工人反对派”，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派别集团。他们和托洛茨基从两个极端走到一起。托洛茨基企图通过“工会国家化”走到瓦解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步，“工人反对派”则打算通过把全部国民经济管理事业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途径，来取消党的领导 and 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说：工团主义把各工业部门的管理交给按生产部门分割开来的非党群众，“这就抹杀了党的存在的必要性，就不会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培养群众，来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真正集中在他们手中。”^⑤“要管理，就需要有一支久经锻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大军，这样的大军是有的，这就是党。一切工团主义的荒谬言论，生产者的指定人选，——所有这些都应当扔

① 《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页。

②③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页。

④ 《列宁全集》第32卷，第71—72、72页。

⑤ 《党内危机》，《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页。



到廢紙簍里去。”^①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进一步批判了这种錯誤傾向。列宁說，他們的主張是完全違背馬克思主义的。因为第一、“‘生产者’这个概念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半无产者以及小商品生产者，因而完全离开了階級斗争的基本概念，違反了明确地划分階級这个基本要求。”第二，他們那种“专门指靠非党群众或者迎合非党群众的思想，也是根本違反馬克思主义的。”^②

工人反对派为了掩飾他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場，举出恩格斯关于把生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来为自己辯护。列宁指出，工人反对派利用恩格斯的論断来为他們的論点辯护，無論如何是不行的，“因为很明显，只要把原著切实查对一下就可以肯定，恩格斯讲的是沒有階級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对我們大家來說都是毫無疑問的。一个社会已經沒有階級，当然就沒有工人和农民，而只有生产者（工作者）了。我們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清楚地知道，他們是把还有階級的时期和已經沒有階級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毫不客气地譏笑那些妄說在共产主义以前階級就可以消灭的各种思想、言論和假想”^③。

列宁分析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傾向的产生，“部分是由于以前的孟什維克以及尚未完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党的队伍，而主要地是由于小資产階級自发势力对无产階級和俄国共产党的影响。”^④

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工人反对派”的爭論，以这些机会主义派別集团的失敗告終了，党組織在爭論中紧紧地团結在列宁的周圍。一九二一年三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作了工会問題爭論的总结，并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統一的決議》、《关于我們党內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傾向的決議》。

合作化——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无产階級取得政权以后，必須通过集体化，引导农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列宁的一貫思想。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列宁进一步地具体地研究这个問題，并且提出了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合作社計劃。

在这个問題上，右傾机会主义者和“左”傾机会主义者的主張，是同列宁的思想根本对立的。右傾机会主义者认为无产階級應該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小农破产，把他們变成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資料集中起来以后，才可以提出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資料公有化的問題；“左”傾机会主义者认为无产階級在夺取政权以后，应当用剝夺小农的办法使他們的生产資料公有化。

列宁在《論粮食稅》以及他最后写的《論合作制》、《論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論著中，回击了这些机会主义者的謬論。

① 《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頁。

②③④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3、237、232頁。



斯大林把列宁的論点概括如下：

“（甲）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待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乙）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們轉归全民所有；

“（丙）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要逐渐地把他們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規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丁）以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規模生产的現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給它們头等拖拉机和其其他机器；

“（戊）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时期內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換）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經濟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維埃貿易，即国营貿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貿易，把所有一切資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①

列宁的合作社計劃，是使农民群众在工人階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工人階級一起建設社会主义的偉大綱領。

十九 坚决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社会主义国家必須支援世界革命

十月革命大大促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也促进了殖民地附屬民族解放运动。正如斯大林所說，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間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經過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綫”^②。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世界各被压迫国家中、在和无产阶级結成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时代”^③。

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指出，捍卫苏維埃共和国，建設社会主义，对于推动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列宁并没有說苏維埃国家的建設可以代替世界各国人民爭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日子，列宁說道：“我們的任务是维护、捍卫和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力量，这个社会主义火炬，这个积极影响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的泉源；在当前情况下，这个任务就是軍事任务。”^④当国内战争临近結束时，他說：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建立共产主

① 《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10頁。

② 《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49頁。

③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4、206頁。

④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28卷，第13頁。



义制度，“这项任务具有全世界的意义”^①，“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②。当苏维埃国家开始过渡到和平建设轨道的时候，列宁就把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主要任务。列宁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③

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建设起比资本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会促进世界革命，同时，也只有世界革命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取得最终胜利。列宁一再强调说：“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④“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⑤“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⑥“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⑦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以及某些自称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党的领导人，用民族利己主义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列宁痛斥了这种叛徒行为，他说：“我看问题，不应该从‘本’国的观点出发（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议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而应该从我要准备、宣传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记了’的常识。”^⑧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而是建筑在对世界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上面。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⑨

列宁同时也深恶痛绝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他说：“我们应该特别坚决地反对‘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思想和沙文主义思想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残余”^⑩。“我宣布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

① 《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379页。

②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470页。

③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7页。

④ 《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三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0页。

⑤ 《在全俄纺织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3页。

⑥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2页。

⑦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7页。

⑧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8页。

⑨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8页。

⑩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9页。



的好牙吃掉它。”^①

革命不能輸出，各国人民的解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是从馬克思以来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坚定不移的主張。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必須同情和支持一切国家人民的解放事业。列宁模范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制定了布尔什維克和苏維埃政府的国际政策。他在为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綱草案草稿中，規定苏維埃国家必須“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屬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②。在为大会起草的決議中，列宁写道：“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全部人力和物力来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③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割裂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資本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认为前者对于后者是无足輕重的东西。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相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屬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④一方面，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沒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他們是不能取得胜利的”^⑤。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只有同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才能順利地发展。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写道：“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維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去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資本主义，如果沒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⑥列宁认为，共产国际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只是在口头上譴責帝国主义，空喊国际主义，而实际上却不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斗争。列宁尖锐地揭露了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假仁假义的行为。他說：第二国际“英、法、荷、比等国的党，都是在口头上仇視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在‘本国’殖民地内进行革命斗争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不經常援助殖民地内已經普遍开始的革命工作，不把殖民地革命政党所需要的武器和书报送到殖民地去。这些党是恶棍和叛徒們的党。”^⑦

① 《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給政治局的便箋》。《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4頁。

②③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4、107頁。

④⑤ 《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7、139頁。

⑥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6頁。

⑦ 《論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2頁。



列宁提出：“凡是願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在殖民地所下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①

无产阶级要领导民族民主革命

列宁科学地分析了殖民地落后国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认为在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也要联合资产阶级，但是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密切地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正确地解决革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

列宁指出，在殖民地落后国家中，封建关系占优势，农民是主要的群众。在这些国家里，除了反对帝国主义外，还要反对封建主义。无产阶级“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②。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③。

列宁精辟地分析了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虽然也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④

无产阶级在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列宁说：“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溶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⑤。他又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与第二国际的英雄同类的改良主义资产阶级。”⑥

列宁分析了十月革命后殖民地落后国家争取解放斗争的新的历史条件，指出：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宣传，各国苏维埃政府尽自己的能力给它们帮助，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紧紧地掌握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把民族民主革命引

①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4页。

②⑤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9页。

③④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1、211—212页。



向彻底的胜利，那末，落后国家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人口的大多数

第二国际和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喋喋不休地说什么“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否认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只有达到了西欧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

列宁嘲笑了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和他们的俄国同道，说“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① 经济落后的俄国，利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革命形势，比经济发达的西欧国家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俄国革命的特色。列宁这样回答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②

俄国是这样，在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东方，也会是这样。列宁说：“我们的欧洲庸人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③

列宁就是这样满怀信心地来评价东方的革命。他确信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一定会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得自己的解放，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他说，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压迫者在斗争中运用了最优良的武器和战术，似乎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一旦把千百万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真正唤醒，就会有极大的本领，就能创造奇迹。”^④

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列宁说道：“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历来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而至今仍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停滞和腐败的数亿人民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新民族和新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⑤

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人口的大多数。列宁说：“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进攻击败了市僧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外面、只

①②③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435页。

④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1页。

⑤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4页。



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进攻联合起来，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①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列宁又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②

結 束 語

毛澤东同志說：“馬克思主义必須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③

偉大的列宁的一生是在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尖锐的斗争中渡过的。列宁自己这样写道：“这就是我的命运。連續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这是从一八九三年开始的。庸人們的仇視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拋棄这个命运去同庸人們讲‘和平’”^④。正是在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其他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列宁保卫了馬克思主义，并把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斯大林曾經說：“列宁主义是在对各色机会主义，其中包括对西方的中派主义(考茨基)以及对我国的中派主义(托洛茨基等等)进行无情的斗争中产生、成长和巩固起来的。”^⑤“列宁的方法的原理，在馬克思的学說中基本上已經有了。这个学說，照馬克思的話說来，‘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貫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为列宁的方法仅仅是馬克思的方法的恢复，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馬克思的唯物主义辯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⑥

他又說：“列宁始終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馬克思主义的原則为依据的。”“但是列宁不仅仅是馬克思恩格斯学說的实行者，同时还是馬克思恩格斯学說的继承者。”“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資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学說。这就是說，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馬克思的学說，他給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所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4頁。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3—454頁。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頁。

④ 《給印涅薩·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48頁。

⑤ 《論布尔什維主义历史中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7頁。

⑥ 《論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8頁。



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进行长期的、坚决的、顽强的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就根本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就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

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派别，决不会自行消失，决不会自己改邪归正。列宁说：“一八七一——一九一四年这个时期的相对‘和平的’性质给机会主义提供了养料，它起初只是一种情绪，后来成了一种流派，最后竟成了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一个集团或阶层。”^②“在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中间可能有个别人会回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但是社会沙文主义或（这完全是一回事）机会主义的派别却不会消失，也不会‘回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③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发展和破产的历史证明，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随着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派别，只会在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敌视革命的道路上愈跑愈远。

修正主义派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但是，他们又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列宁说：“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④“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作的这种‘修改’是一致的。他们遗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善于识破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这种鬼蜮伎俩，应当像列宁那样无情地撕下他们的假面具，使他们在广大群众面前丢丑，使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藏身之所。

①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5—88页。

②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2页。

③④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6、117页。

⑤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3页。



列宁指出，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斗争的关键在于争取群众。他说：“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到更下层和更低层中间即到真正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①“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专政，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②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列宁说：这种斗争，“有时熾烈起来，火焰腾腾；有时又静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隐燃着。”^③即使老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破产了，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它们总是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培养新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初曾经预言：“我们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统一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定会成长起来新的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和新的和善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④。这就告诉我们，要时刻注视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出现，并同他们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斗争目标，了解事变的全部规律性，坚定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可靠地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尽管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可以喧嚷一时，但是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它毕竟是一股逆流，终究要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洪流所淹没。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挡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前进！

（續 完）

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8页。
 ②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页。
 ③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18—319页。
 ④ 《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5页。

